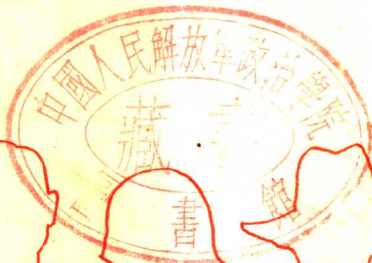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命 革 業 產

著 曠 西 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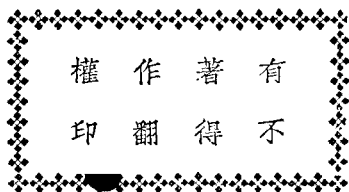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行
一九四九年七月再版

大眾文藝革命（全一冊）
化叢書

◎ 基 價 四 元

（郵運匯費另加）



著 者 涂 西 疇

發 行 人 李 虞 杰

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埠中華書局

產業革命

第一章 產業革命是怎樣的一回事

一 產業革命是什麼意思

在未講到產業革命的具體事實之前，對於『產業革命』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意思，有先加以解釋的必要。因為這個名詞在我們中國的古書上，是找不到的，它是文化上的舶來品，是從英文 Industrial Revolution 這兩個字翻譯過來的。雖然這譯名從字面上去看，也可以大致理解到它所表達的意思；但究竟「產業」(industry)和「革命」(revolution)這兩個字，並不是中國的固有名詞。在中國的古書上我們祇看到「產」字，譬如喜歡談論經濟政策的管仲和孟子，在他們的著述中就用過「產」字，管仲所說「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視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穡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

經產也。」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管、孟兩氏所說的「產」，雖然也可以用白話「產業」兩字去解釋，但他倆所說的「產」，與其他古書上所說的「財」「貨」等字眼，却是完全相同的意思。「革命」這個名稱，自滿清末年以來，雖然也成爲很流行的術語，大家也大致知道它是怎樣的意思；但把「產業」和「革命」四個字構成一個名詞，在缺乏新知識的人，就有點費解了。

事實上，不獨在缺乏新知識的人不大明白，就是有一點新知識，甚至外國文懂得很多，能閱讀外國文書籍的人，也不一定就明白「產業革命」的真實意義。所謂「新的知識」這個「新」字，在一般習慣的說法上，是表示着較近的、現代的、西洋化的意味，並且還是與中國古舊的、陳腐的在相對意義上來說的。但較近的、現代的、西洋化的知識，也不一定都是正確的科學的知識。具有新的知識的人們所理解「產業革命」的意義，也不過是從外國人或外國學者的著述上傳習吸收過來的。許多外國人和著作，對於「產業革命」意義的理解和詮釋，庸俗謬誤的多得很，從

而薪火相傳，自然仍舊是庸俗謬誤的。

許多知識上的庸俗謬誤，並不全是理解力的不夠，或者無意的犯了錯誤，而且還有不少人故意製造謬誤來掩蔽事實的真相。這在社會的知識方面尤其如此。「產業革命」是一種社會的大變革事件，社會事件總是包含着或關聯着社會階層或集團利害的對立關係。因此，各利害不同的階層集團成員，對於同一社會事象，由於它關聯着彼此不同的利害，從而彼此看法想法或說法，就免不了互有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比如太平天國事件，本來是中國廣大貧苦農民，武裝起來要爭取解放，革滿清統治者的命，但腐敗的滿清統治者，却視爲「匪黨」「叛亂」，稱之爲「粵匪」「髮逆」，「洪楊匪亂」。這種相反的看法說法，理由很簡單，因爲太平天國的革命，是要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統治剝削特權。這在被革命者爲着保護其既得權利，掩飾自身的醜惡腐敗，自然會當作「逆匪」「叛亂」相看，以便「名正言順」與兵「戡亂」。此風自古已然，在外國亦復如此。也正因此故，對於「產業革命」這種社會大變革的事實，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說法。最庸俗而又最普遍的看法

和說法，是從表象着眼，看到產業革命過程中發明了許多機器，從而便把「產業革命」這種社會的大變革當作是純技術的機器革命，當作是少數天才的發明家發明的機器所造成。這種庸俗的意識，傳染到中國也很普遍。不少人以為祇要從外國買進幾批機器，派送幾批學生到外國去學習幾套使用機器的技術，聘請幾位洋顧問和技術專家來指導指導，把機器安好，工廠開起來，我們就可以和別的先進國一樣工業化起來，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完成「產業革命」。

我們並不否認「產業革命」是少不了機器和大量專門的技術人材，但僅有這些條件就可以完成「產業革命」的話，那我們這個國家早就完成了這件歷史的偉業，早就成了現代化的國家，那裏還是現在的落後呢！略為明白中國近百年史的人都會知道：八十年前倡辦洋務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滿清高級官僚，他們何嘗沒有從外國買進大批機器？又何嘗沒有派送留學生到外國去學工程技術？他們所開辦的工廠，在量與質兩方面，都相當可觀，並且還是官辦，具有政治上許多特權的有利輔助條件。然而結果呢？不獨沒有把中國工業化起來，而且所辦的工廠，都變成了虎

頭蛇尾，買來的機器都放着生鏽，最後拍賣收場。派送出國的留學生，不少都弄得個博士碩士的頭銜與沖地回來，可惜「英雄無用武之地」，學得的技術無地方應用，以致那些博士碩士的專家先生們，不得不改行。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我們這個國家還沒有具備着使他們學得的技術可以盡量應用的社會條件。這些事實也就足夠證明僅有技術條件，是不可能完成產業革命的。

同樣，我們也不否認產業革命是包括着許多機器的發明這種事實之內。但與其說機器的發明造成產業革命，毋寧說是產業革命業已揭幕，才激誘起機器相續發明和擴大應用。如果一個國家的產業革命尚未揭開序幕，尚未具備產業革命的社會條件，那不獨不可能激發機器相續發明；即使機器有了發明，也不會擴大應用。在古代希臘就曾經發明了簡單的蒸汽機械，但他的發明並沒有促成古代希臘發生產業革命。這正說明了古代希臘還沒有具備產業革命的社會條件，所以這個發明也不能擴大應用，從而發明者也不能成爲一個像瓦特（Watt）那樣的產業革命英雄。指南針是中國人在幾千年前發明的，在先進國從產業革命以來，早就把它應用到輪船飛機

和各種的機械指導儀器上，而且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它出生的祖國呢？慚愧得很，直到現在，鄉下人還是用它看風水，僅僅做迷信的工具。可見發明並不一定就能引起產業革命。現代初期英國人相續發明了許多機器，正是由於那個時候英國的產業革命諸社會條件都已具備，迫切需要發明所使然。因此，假使瓦特是生在中國的話，我敢武斷的說，他一輩子還是一位燒開水洗茶壺土頭土腦的工役瓦特，而不會成就爲一位歷史上的發明和產業革命英雄的瓦特。

我們應該明白：產業革命並不單是生產技術上的大變革，而且是一種社會體制脫胎換骨的大變革。更明確的說：它是封建社會體制蛻化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體制那種轉形表現的社會經濟大變革，亦即是舊的封建社會體制的崩潰與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誕生的一種歷史大轉形的變化過程。這種轉形所表現的社會經濟大變革，是包含着極複雜的內容。因爲社會體制是一種極複雜的有機構成體，它有一種特定的「生產方法」，作爲那種社會體制性質的標幟，以及由那種特定「生產方法」而形成「生產諸關係」的全結構，作爲那種社會體制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建

立着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機構制度。所謂社會體制，就是指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那基礎上所存在的政治法律上層建築有機構成的總體而言。所以社會體制的變革，不單是「生產方法」所形成的生產部門以及聯結各生產部門的人與人所結成的「生產諸關係」之變革；而且還包括着政治法律機構規章的變革。封建社會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體制，是人類歷史本身成長發展必然會發生的變革過程，同時也是每一個國家由封建社會進入現代社會都會經歷的。所以「產業革命」也是每一個現代化了的國家都發生過的社會經濟大變革事件。這種大變革，表現在生產部門，尤其是工業生產部門的變革上特別顯著，所以被人稱為「工業革命」。因為工業上這種變革，是由用手直接操縱着簡單的勞動工具從事小規模生產的手工業，轉變為用複雜而龐大的機器勞動工具從事大規模生產的機械工業，從外表技術上去看，好像這種變革全是機器發明和應用所造成的，從而也就把「產業革命」看作是純技術的事件。這不單是皮相的看法，而且是錯誤的理解。如果不從社會體制的變革上去理解，那不獨不易明白「產業革命」的全盤內容，而且無法瞭解何以會有許多機器

發明和擴大應用機器生產這些事實的由來。

就文字所表達的意義來說，industry 這個字，也並不是單指工業，還把農業礦業商業乃至金融業包括在內，就其存在性質與發展變化來看，這些經濟部門又都是有機的密切關聯配合着。任何一個部門是無法單獨發展變化的。而它們的發展變化，又必然要牽連到政治和法律的變化，這些變化內在關聯的必然性，後面我們還有剖析說明的機會。

這裏我們還要指明的，是許多人把「革命」(revolution)這個名詞的概念理解得非常單純，非常片面；以爲把舊的推翻了，就算是「革了命」。這與其說只理解得半截，毋寧說是理解錯誤。「革命」固然是包括着舊的被推翻或者說是被否定，但僅僅是推翻或否定了舊的，而沒有誕生新的高一級的東西，那還不能說就是「革命」。比如一個雞蛋被孵出小雛雞來，這個雞蛋才算是被它孵化出的小雛雞革了命，如果這個雞蛋被孵壞了沒有產生出小雛雞，而變成了壞臭蛋，那就這個雞蛋本身正常的發展來說，就不能說它那種變化是「革命」，祇能說是「喪命」。必須在

否定舊的變化過程中，同時又產生了高一級的新的，才算是「革命」。社會的革命也同樣是包含着這個意思，是指舊的社會體制崩潰瓦解，新的社會體制誕生的，一個蛹化蛻變的過程。所以「革命」這個概念，是包含着「破壞」與「建設」兩層意思，也就是說「破壞」與「建設」是「革命」這一件事的兩方面。「建設」是產生在「破壞」的對極，革命對舊的加以破壞，祇是掃除新的建設上的障礙，使新的建設能夠順利達成。不把舊的障礙因素加以破壞和掃除，那在同一的空間領域上就無法建樹起新的來。正如同一個小雛雞，當它在雞蛋裏被孵成雛雞後，如果不把包圍着它的舊蛋壳啄破，它就不能誕生出來。產業革命是以舊的封建社會體制的破壞為出發點，而以新的現代的社會體制的建立為終結之一種社會的突變過程。有怎樣的革命破壞，才有怎樣的革命建設；後者是前者的對立產物，前者又是後者的清道工夫，所以二者是對立的，同時又是統一的。是相背離的，同時又是相契合的。沒有建設祇有破壞的革命，是消極的革命。沒有通過革命手段的破壞那種粉刷式的建設，亦是不真實不堅固的偽裝建設。所以產業革命要能順利的發展和很正常的完

成，必須對舊的社會體制或封建因素加以澈底的破壞和掃除才有可能。舊的破壞程度如何，它規定了新的內容與形態如何。產業革命在先進各國表現了各別差殊性的類型，祇有從這方面去考察，我們才能明白其所以然的由來。也祇有把握這種變革性，我們才能對「產業革命」的真實意義不致流於皮相的認識和錯覺的理解。

二 產業革命是怎樣發生起來的

要瞭解產業革命是怎樣發生起來的，首先就得明白封建社會體制是怎樣崩潰，在崩潰過程中又如何誕生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這種事實。

前面我們已提到，社會體制是一個內容極複雜的有機構成體，經濟結構是它的基礎，政治法律是存在於經濟基礎上面的中層建築。屬於人們思想意識的文化，是其最上層的建築。這些中上層建築，其形態，其性質，都是受經濟基礎所規定。也就是說：有怎樣的經濟基礎，才產生怎樣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中上層建築。一旦經濟基礎發生了變革，中上層建築也必然要隨着或急或緩地變革。因此，我們要瞭解

封建社會體制的崩潰，就得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如何發生變革而促成封建社會體制的崩潰。

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由封建的生產方法作內容核心而構成的；這種生產方法是社會體制性質和形態及其能否繼續存在的決定者。封建社會體制與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不同，就是由於二者經濟基礎構成上的生產方法不同來區別的。而封建社會轉變或發展成爲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在這轉變過程中而發生的產業革命，也是由於這種生產方法的轉變造成的。因此，我們要考察產業革命是如何發生起來的，就得考察封建的生產方法是如何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

但讀者不要誤解，以爲「生產方法」是指像木匠製桌子用鋸和斧頭如何把木頭劈開，又如何鉋平，如何鑿孔，裝成桌子，或者像農夫如何犁田，如何播種施肥，如何收穫農作物，那樣勞作的技術生產方法。而是指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特殊的生產手段佔有者與活勞動力所有者結合起來那種社會生產關係的樣式而言。這是社會科學上特有的一個學術名詞，是從德文 *Produktion Weise* 或英文 *The mode of*

Production 翻譯過來的。有的譯爲「生產方式」，因爲任何生產是少不了生產手段（包括勞動對象物和勞動工具）和活勞動力這兩個基本條件。但在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裏，生產手段是被某一部分人所佔有，而沒有生產手段的人，要生存的物質資料，就祇有利用別人佔有着的生產手段去勞動生產，以求獲得養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資料。正因爲是出於生存壓迫而不得不使用別人佔有的生產手段去勞動生產，佔有生產手段的人，就居於優勢的支配地位，他就要把使用他的生產手段直接勞動生產者所生產出來的成果，榨取一大部分去，作爲自己和豢養着的人生活享受上的物質條件，這樣的過着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式的生活。

生產手段其所以被人作爲私的財產佔有着，就是由於可用它作爲剝削別人的工具；也祇有可用它剝削別人，私的佔有才有意思。生產手段佔有者榨取去的部分愈大，則直接勞動生產者所得的自己勞動成果部分便愈少。所以在私有財產制度下的社會，「生產方法」是包含着利害對立的兩個社會階層：生產手段佔有者，是統治階層；使用那種生產手段直接勞動生產者，是被統治階層。也就是各種私有財產制

度社會最主要最基本的兩大對立階層。這兩大對立階層在生產方法上結合着的形式，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所規定；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上所形成起來的生產方法以及圍繞着這種生產方法而聯繫起來的人與人的諸經濟關係，即所謂社會諸生產關係，又規制着社會生產力可能發展的程度。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形成了一定樣式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當它們形成後，起初對社會生產力是有護育作用，但到後來那種生產方法上的生產關係由定型化而變成硬殼，從而它內部生產力的發展便受到束縛，成爲生產力發展上的枷鎖，由此而引起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衝突，引起整個社會體制的動搖；到這場合，生產力要能進而發展，就得形成新的生產方法，把舊的生產關係突破或改造。一種社會體制轉變發展到高一級的新社會體制，就是由於它的經濟基礎經過這種變化來實現的。封建社會體制轉變爲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就是封建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來實現的。前者不崩潰瓦解，後者無法誕生和成長，後者雖然是從前者的體內被孕育成的，但它發育誕生非把母體摧毀不可。正如同一只被孵的雞

蛋，當它被解成小雞，它一定要把包被的蛋壳啄破，才能誕生出來。

在封建社會，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手段，它是由封建的貴族領主所佔有，直接生產勞動的是農奴。農奴是不能自由的離開領主的土地，祇是領主土地上的附屬品而已。農奴全家人靠領主那片土地生產勞作過活，領主又是靠農奴提供一定的勞動力或勞動生產出來的生產物作為寄生生活的物質條件，亦即是以自己領有的土地作為剝削農奴的工具。在中世紀歐洲的封建社會，領主是把自己隸屬下的農奴構成一個一個的莊園。農奴不能任意脫離莊園，領主是莊園裏的小皇帝，靠莊園裏的農奴勞動提供各種生活物資而過着寄生生活。農奴對領主除繳納規定的貢稅外，還要替領主服各種義務勞役。領主對農奴亦有保護的責任。各莊園不發生橫的物質關係，彼此都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農奴與領主所結成的這種社會經濟關係的樣式，便是所謂封建的農奴生產方法。

往後發生了城市，城市裏住的手工業者都組成行會，即所謂「基爾特」(guild)。「基爾特」裏的學徒也和農奴人格身份一樣，是受老闆或師傅所管束，沒有屆滿規

定的年限出師之前，是沒有一點自由行動的權力，手藝學成出了師，也還要對老闆或師傅盡許多義務。所以「基爾特」的手工業生產，也是一種封建的生產方法，生產手段是老闆或師傅所佔有，學徒祇得點飯吃而已。老闆或師傅肝火發了，還會常常挨打。在中國內地城市裏，你還可以看到鐵匠師傅總是有一兩個小鐵匠，拿着鐵錘翻腰的幫助師傅錘打，或站在師傅旁邊拉風爐；皮匠店裏總是坐着一兩個小皮匠，幫師傅搓麻繩補爛皮鞋，常常被打得眼紅紅的：他們就是學徒。在封建社會，無論是莊園裏的農奴，或基爾特的手工業者，他們勞動所使用的勞動工具都是很簡單的，生產規模也很小。生產目的一般都是自給自足。直接生產勞動者是沒有勞動的自由。他們所受到的剝削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多種多樣的，這就是封建生產方法的特徵。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法就大不同了，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是資本主義社會兩個主要的對立階層，資本家不是靠佔有大量土地來剝削他人，而是靠佔有大量資本，用工資購買勞動者的活勞動力和其他生產條件來從事「爲賣而買」的商品生產

經營。他從市場上買進各種生產條件來生產商品，不是供給自己和家人直接消費，而是要把它再賣出去，所以是爲「賣」而「買」，爲獲得一定額的利潤而經營商品生產。

利潤的源泉是工資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即工資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自己在工資形態上祇收回一部分，剩餘的部分即所謂「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所攫取去了，變成資本家的利潤。由於工資勞動者是自由的出賣自己勞動力給資本家，而其他人格身分又與資本家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資本家對工資勞動者的剝削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加之資本家爲獲得更多利潤，力求自己經營的商品價廉物美，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從而盡力設法改進生產技術，擴大生產規模，由是造成現代物質文明突飛猛進；以致資本家的剝削行爲，更被掩飾得不明確了。這也正是資本主義或資本家生產方法的特徵所在。

這裏我們不打算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盤結構，所以不想進而多說，祇是藉此指出資本家生產方法的形成，是需要兩個基本的前提條件：即失去了生產手段而

其人格與身分又是完全自由的大量工資勞動者；以及可供大規模生產經營的巨量資本。前者是屬於人的條件，後者是屬於物的條件，這兩方面的條件都是由封建社會體制的崩潰瓦解創造出來的。創造這兩種條件的社會變革過程，在經濟科學上又有一個專門術語，名叫「原始蓄積」。

所謂「原始蓄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是與「現代蓄積」相對稱的。現代蓄積即是指產業資本家的蓄積，是以大規模的生產為基礎，蓄積的資本家以一定量的巨額資本投入生產經營中，使生產的結果比原來投入的資本價值額增大起來實現的，也就是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來進行蓄積。原始蓄積就不同了，它不是把大規模商品生產經營作基礎，而是把小規模生產的農業和手工業作基礎。蓄積者並不直接經營生產，而是置身於生產之外的流通界，以賤買貴賣的商業活動或以高率利息放賬的高利貸活動以及運用政治軍事權力向國民徵課重額租稅，或發行公債強制國民承銷，乃至用武力掠奪殖民地或落後國人民的財富和勞動力等方式來進行蓄積。所以這種蓄積是很野蠻而殘酷的剝削行為，但却是資本家生產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

準備工夫。

從社會經濟自我發展演進上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活動對封建經濟基礎的崩潰瓦解和原始蓄積的增殖，確是擔任了極重要的脚色。

在封建的前期，各莊園過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是沒有抬頭的機會。往後由於莊園內部的分工和生產力發展提高了，各莊園的剩餘生產物也隨之增加，於是莊園與莊園之間便發生了交換關係，商人也跟着出現了。由於交換關係溝通了各莊園的物品交流，長於手工業製造的農奴便放棄農業而專從事於手工業，在領主一定條件的允許下，他們便首先離開莊園而移居於定期集市的地點，以求生產品交換便利。隨着肩挑游動的商販也相續定居於市集，從而市集上便出現作坊和商店，進而發展成市鎮，由市鎮發展為城市。居在城市裏的手工業者和商人都組織有同業的「基爾特」行會，起初也是受莊園領主所支配，負有納稅給領主和其他各種義務。

但商業的發展竟成爲侵蝕莊園的主要破壞者。因爲商人是商品的中介買賣者，

同時也是貨幣的掌握者。貨幣是一切交換物的共通手段，有了貨幣在手裏，就可以隨心所欲購買其他一切可買的東西。在交換關係擴開了，領主們的消費物品也不受自己莊園生產品所限制，從而消費慾望也必然會隨着擴大。爲着交換上的便利而要求取得貨幣，要求農奴把實物的貢納改爲貢納貨幣。這一來，商業資本便獲得了極有利的發展機會。因爲農奴要取得貨幣去繳納貢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生產物出賣給商人，因此商人就正好利用對方「不得不賣」的機會壓低價格，達到賤買的目的。這是對農奴剝削，累積商業資本的有利條件。

在領主方面，由農奴所繳納的貨幣，又得轉向商人買進各種消費品，而且也是不得不買。這又給商人抬高賣價，達到貴賣的目的。這又造成了商人對領主的僭取機會。領主的購買力是由剝削農奴得來的（雖然商人也對領主納稅，但把稅額加在賣給領主的商品價格上就行了），商品價格高，領主就會加強對農奴的榨取；這樣獨立活動的商業資本僭取領主的部分，又落到農奴身上。

在多重剝削下，農奴不獨無法改良生產，而且無法生活下去。爲生存所迫，不

得不向握有貨幣和商品的商人告貸或預賣生產物。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便是這種預賣的寫照。由於是受生存威脅而告貸、而預賣，貸放款或預買的人，就有機會任意提高利息或壓低預買價格，高利貸就是在這種乘人之危的場合高起來的。生產物廉價的預賣了，收穫之後，又不得不再買入；沒有錢，又祇好告貸或預賣。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這對「孿生子」，便是這樣把自己蓄積起來，同時也就是這樣把小生產的農奴蹂躪得遍體傷痕，造成生活與生產條件愈益惡劣。而消費慾望擴大了的領主，不獨不會因農奴處境日益惡劣而減輕榨取，反而要加強榨取，這就造成農奴無生存的餘地，反抗暴動，或逃出莊園流浪乞食，就成爲不可避免的必然事象。領主的莊園經濟體系，就是由此而動搖，封建的農奴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便是這樣開始潰解而無法維繫。

在城市的「基爾特」手工業者，也是遭到同樣的命運。因爲「基爾特」手工業者，不獨生產所需要的原料糧食賴商人提供；而且生產的製造品，也要依賴商人販銷，商業資本在這方面又獲得貴賣賤買的對象和增殖自己的機會。手工業小生產

者，一旦落入了商業資本的剝削網羅，生產條件和生活處境自必日趨惡劣，結果也免不了與農奴一樣，靠高利貸和預賣來過日子。

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所有者，就是這樣控制了手工業生產，最後變為商人所有，原來的組織隨之解體，學徒獲得了身份的解放，與脫離莊園的農奴一樣變成除活勞動力可賣以外就一無所有的自由窮光蛋。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就是這樣從封建生產方法潰解中產生出來的。到這場合，商業和高利貸資本自身雖然累積成爲巨額的資本；但累積源泉，則因小生產者的破產而枯絕。要能繼續累積，就得轉爲生產資本，自己僱傭工資勞動者經營生產。原始蓄積就是這樣的提製出產業資本家生產方法賴以形成的人的條件與物的條件，也就是這樣的轉爲現代蓄積。

當資本家生產方法日益擴大，取得生產領域支配地位，封建的經濟基礎便變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原有的諸上層建築，也就隨着或急或緩的崩潰下來，而從新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現代的政治法律與文化諸上層建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由此誕生。產業革命的發展由此飛躍前進，迅即完成。

但上面的說明祇是解剖封建社會體制轉為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內在關聯發展變化的必然趨勢。然而先進各國在這種社會體制轉化變革具體所表現的事象，却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掀起社會階層鬥爭的驚濤駭浪。並且也不是每一個國家關着門像在溫室裏生長發育地轉化，而是許多國家在轉化過程中就曾對外展開積極的各種經濟政治乃至軍事的侵略活動，補充原始蓄積的條件。因為封建的貴族領主階層，爲着維護乃至挽回其既得權利，必然要運用政治軍事力量來阻撓這種變革，從而對農奴暴動逃亡加以屠殺和鎮壓，對新興市民階層的經濟活動橫加阻抑。這樣，掌握了大量資本的新興市民階層，爲着自己集團經濟利益的擴展和擺脫封建特權的束縛，推翻封建集團的統治勢力，爭取政權，便成爲發展自己階層經濟利益的重要手段。這便促成了新興市民階層聯合農工羣衆反封建爭自由的民主革命。有的國家就是經過這種革命浪潮洗除了封建勢力而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政權，替產業革命鋪好順利發展的坦途，由是而完成社會體制轉化的歷史業績。有的國家封建統治階級，看到大勢已去，無法挽回，革命浪潮洶湧可怕，便順風轉舵自動的解放農奴，放棄若干封

建特權；或轉化爲資本家；或把土地以低額地租出租與農業資本家，做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多大勢力的地主；或者僱傭工資勞動者自己來經營農場，以地主身分兼做農業資本家，在政權上與新興資產階級妥協起來，把舊政權略爲改裝粉刷一下，使其適應新的情勢，這樣的達成舊社會體制妥協的解消轉化。有的國家在原始蓄積上，用商業資本或武力侵略，從國外的殖民地或落後國人民手裏劫取大量資源和勞動力，以補充其本國原始蓄積，加速產業革命的發展。有的國家沒有得到這種補血條件，國內原始蓄積又較薄弱，則用政治力量，通過公債賦稅政策，向人民壓榨徵課，以其收入由官方舉辦新式企業，或用獎勵補助津貼等方式扶植新興產業，或用立法手段壓低工資和原料糧食價格，以利產業的發展。所以各先進國由封建社會轉入資本主義社會，在其轉化過程中也通過不少人爲的措施。這些措施，有的是反動的，是阻撓社會發展的；有的是進步的，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但反動的終不能阻住歷史車輪的前進，結果都被歷史巨輪碾碎了。進步的措施也是在歷史發展趨勢業已形成，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才能有效的推動。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已可明白：現代資本家生產方法的形成，是把原始蓄積潰，解了封建的生產方式，從而封建社會體制所提製出來的條件作基本前提的。沒有原始蓄積提製條件，封建社會體制沒有潰解，或者原始蓄積所創出的條件由其他原因損毀了，資本家或現代的生產方法，是無由成長起來的。也祇有資本家或新的生產方法成長起來了，在商品生產的自由競爭裏，不斷提高生產力，改進生產技術，才能激起各種技術的發明和擴大應用，才能促成產業革命表現在社會各經濟部門突飛猛進的巨大變革。

三 產業革命是怎樣發展完成的

說「產業革命」是封建社會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體制所表現的社會經濟大變革，這就「產業革命」發展和完成上去看，更可明白。

許多人把「產業革命」當作純技術的事件理解，一方面不從發生的社會背景上去看，另一方面又不從其發展的社會條件內在關聯上去考察，祇着眼於技術條件的

配合，而且又祇拘限於首先完成產業革命的英國所表現的那種典型的樣式，而把其他後起的國家的產業革命所經歷過的情形不放在眼裏，致犯這種理解上的不正確的毛病。

從技術方面去看，在一個自發性極典型的產業革命，表現在各經濟部門的那種極自然的變革程序，即由輕工業發展到重工業，由工業部門發展到農業、礦業、商業以及金融業等部門，好像全由技術支配似的。因為輕工業是製作直接消費品的工業，在生產製作上，不一定要使用巨重的鋼鐵勞動工具，有較簡單的發明新式木質工具和使用人力、畜力、風力、水力就可使生產量增加，生產規模擴大。直接消費品大量增加了，人們才有較多的時間、精力去改進間接生產品的生產工具，由是使已發明的新式工具進而改良和擴大其規模。

輕便木質的生產工具改進擴大到某種程度，就需要鋼鐵的材料來配合建造，否則，不獨不耐用，而且不能大規模的建造。在推動這種較巨大規模的生產工具，又需要較大的發動力。人力畜力有限，不够應用；風力水力又要受自然氣候和地理條

件所規限，不便經常的充分使用。因此，才促成鋼鐵生產技術和蒸汽機的發明，以冶鐵煉鋼爲重心的重工業才發展起來。重工業發展起來了，可以大量製造鋼鐵的機械工具，且有較大的蒸汽力經常推動，它反轉來，又促使輕工業生產技術和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發展，從而輕工業部門所需要的原料大大增加。

輕工業的原料主要是來自農業生產界，這樣便促使農業生產界技術的改進，而重工業又能提供農業生產的機器工具。農業採用了機器工具從事大規模農場耕作，不獨使原料糧食生產量大增，可以充分供給工業部門；且可在機器使用上節省出大量勞動動力供給工業部門。這樣農工兩部門便得到配合的發展。重工業的原料是來自礦業生產部門，重工業擴大發展又引起礦業生產技術改進的要求；而工業農業部門發展了，又能提供礦業生產部門大量直接消費品和開礦用的新式機器與勞動力，礦業生產就可大增；它反轉來，又可使重工業及其他生產部門更進而發展。

各生產部門生產物大量增加了，運輸交通工具的改進，便成爲迫切的需要。而在重工業的發展下，技術條件也可以製造輪船火車鐵道和開鑿運河，交通運輸工具

便得迅速發展起來。同時，機器生產量龐大而種類單純，任何人所需要的物品在數量上有定限，而在種類上却需要多種多樣的。所以用機器生產，就不可能是自給自足。大量生產品必需出賣，所需要的生產條件和其他種類的消費品，又得從市場買進。這樣，社會的交換關係就大大的繁複起來。而交通運輸又日趨便利，各地物品交流又很方便，分工生產勞作更趨發展。專從事於商品買賣作為生產與消費聯繫中介的商業，以及工商業集中地點的都市，便蓬勃的發展起來。交換關係與交換規模日益繁複和擴大，貨幣需要大增，貨幣的支付和融通方式也迫切需要改進，以專門從事貨幣資本經營活動的銀行金融機關，相應而發展起來。社會經濟由此而全部改觀，也就是產業革命完成而造成的新形態、新場面。技術發明和改進，也就是這樣表現為造成「產業革命」的外觀。

我們並不否認在產業革命過程中，各經濟部門技術條件的發展變革有着內在有機關聯的程序和相互促進的機能，更不抹煞各種發明的機器工具在產業革命發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但把產業革命社會經濟各部門發展變革，片面的歸因於技術條

件，而忽略了社會各種條件的提供配合，那不單是非常皮相的看法，而且是很不正確的看法。嚴格的說，如果沒有一定的社會條件配合，那即使從先進國移植技術進來，也無法擴大應用的。即使在某些經濟部門勉強利用起來，也不可能促起其他部門跟着發展變革，結果會成爲一件舊爛棉袍上補上一塊新緞子補疤，極不相稱，也不耐穿。而且新的緞子補疤終會很快的隨舊爛棉袍一同變成不能繼續穿用的廢物。在近代史上有很多事例可以證明，下篇中還有敘述到的機會。這裏我們要先加說明的，是需要怎樣的社會條件才能使產業革命順利發展起來。

第一，需要有合理的土地佔有關係——所謂合理的土地佔有關係，即土地佔有關係能够配合工業的發展；更具體的說：必須土地佔有關係不束縛土地生產上的活勞動力，並能實現大規模的經營，採用新式機械農具，提高農業生產力，從而增大農民購買力。這樣，工業生產才能獲得大量活勞動力和原料糧食。生產出來的生產品，才能有廣大的銷售市場。束縛土地生產的活勞動力與生產力，是封建的土地生產關係，或剝削關係。因此，封建剝削關係的摧毀，是農業生產力解放與配合工業

發展的基本前提。這種剝削關係的解除，必須創製以次的條件，才能有效促進產業革命的發展；那就是不獨要勞動力可以自由使用，而且要從事土地生產者或土地生產經營者有改良生產條件的能力和願意採用機械農具。因此，又必須地租率減低。如果地租率仍高，那不獨耕作土地或經營土地生產的人無法獲得蓄積，從而無法改良生產條件，替工業生產提供大量原料糧食與產品市場購買力；即使有資金改良農業生產條件，亦不願去改良和採購新式機械農具實行大農生產，而會把資金用去購買土地，坐收高額地租。一個社會地權買賣漩渦裏吸去的資金愈多，則生產部門能得到的資金供給便愈少。這樣，地租上累積起來的財富，固然不會轉入農工業生產部門，就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在原始蓄積過程中累積起來的，亦不會轉化爲生產資金或生產資本。這就會使農工業擴大生產所需資金或資本不易得到。這樣，農業就不可能配合發展起來，產業革命的發展，必受阻抑。所以合理的土地佔有關係，是產業革命發展上極重要的社會條件。

第二，需要生產者或生產經營者掌握全國統一的政權——一定形式和一定性質

的政權，雖然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建立起來的，但它的存在，對於社會經濟基礎有着極重要的作用。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基礎的改革如果沒有政權的改革，那不獨經濟上的改革不能徹底實現；即使改革了，也不能使新的經濟秩序獲得穩固和發展的保證。舊的政權勢力，又會使舊經濟因素與舊經濟關係復活起來，從而絞殺新經濟因素，破壞新經濟關係。祇有政權隨着社會經濟的變革而嶄新建立起來，它才能發揮掃除或澈底改革舊經濟關係的力量，採取護育和促進新經濟成長發展的有效措施。近代初期各先進國由資本家生產方法成長擴張而推動的產業革命，其發展完成，無一不是由新興市民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才能達成。這就是由於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是代表資本家集團的經濟利益，為謀自己集團利益擴展，對於妨礙資本家生產方法發展的舊社會因素，運用政治立法權力加以掃除，是最有力的手段。而對於護育促進或有利於資本家生產方法發展所需條件，運用政治立法手段予以創立扶植，又是最有效的辦法。資本家生產方法所推動的產業革命發展，需要資本家掌握全國統一的政權才能實現，非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推動的新社會經濟發展，同樣

是需要這種新社會經濟建設領導者或擔當者來掌握全國統一的政權，才能實現。

第三，需要獨立自主的關稅權和健全的財政金融制度——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的關稅權，是防止外來商品傾銷與調節出口貿易、扶植本國工商業合理發展的重要工具。如果沒有這工具靈活運用，讓外來商品傾銷，佔據市場，掠奪原料，應當輸出的產品，又不能合理的輸出，以換取自己經濟發展上所需要而有賴輸入的東西，那自己國家的幼弱產業，在外來商品壓力下與自己條件缺乏下，就免不了要陷入枯萎凋落的厄運。已有的商業資本也會轉化為替國際帝國主義侵略商品服務的買辦資本，從而幫兇地摧殘本國產業。在世界各國沒有那一個國家，無獨立自主的關稅權和在外來商品傾銷壓抑下能把產業發展起來或完成產業革命的。同時也沒有那一個國家，在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吮盡民脂民膏的財政政策下，以及貨幣流行不統一，通貨惡性膨脹，金融物價劇烈波動下，能使產業發展或完成產業革命事業的。

這道理非常明顯：一個生產者或生產經營者在生產上所得的成果，或物質價值的財富，被統治政府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剝奪去了，或者由惡性通貨膨脹，把他手中

的貨幣或貨幣資本的價值急劇地削減了，他就無法維持生產條件繼續進行再生產，最後勢必關門大吉，陷入破產厄運。而在一個國家內，貨幣流行不能統一，則資金週轉與商品流通，就會大受阻礙，從而需要資金週轉便利和商品市場擴展才能發展的諸生產事業，自不可能擴大發展，完成產業革命更不可能。所以獨立自主的關稅權與健全的財政金融制度，都是產業發展或完成產業革命不可少的社會條件。

上面所說的諸社會條件，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由人們主觀的去任意製造，更不能到別的國家去搬借來，而是要在自己社會體制合理的變革或改造上才能形成起來。也就是說：產業革命發展完成所需要的技術條件，還可以從先進國移植進來，而技術條件賴以生根和成長所需要的諸社會條件，就不可能這樣辦到，必須從自己社會體制合理變革改造中提製出來。同時，這些社會條件，是有機地關聯着，單獨提製不出來。也不可能用物理儀器化學藥品去塑造，或者技術的措施可以辦到，必須通過社會革命脫胎換骨的大變革，才能造出。下一篇我們進而分析各先進國產業革命經歷過的具體史實，更可明白。

第二章 各先進國產業革命是怎樣經歷過來的

一 英國是怎樣成爲產業革命的祖國

英國是首先發生產業革命，並首先完成的國家。其他各先進國，都落在英國之後才起來產業革命，並且也受到英國產業革命已成就的技術條件所加惠。因此，英國就被視爲產業革命的「祖國」。甚至有些歷史學家，還把「產業革命」祇當作是英國歷史上特有的事。其他各國產業發展變化，都是由於從英國輸入技術條件所造成，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並不否認英國產業革命首先成就的技術條件對於後進各國產業革命起過協助的作用，或推動的影響。但這不能看作是後進國產業革命所發生的主要原因。後進諸國繼起而發生的產業革命，自有其本身的必然原因，外來的促進影響，祇有在其本身已具備一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才能把那種促進影響作用顯示出來。如果把後進各國產業革命，歸因於英國產業革命所造成的或派生的，由是而把產業革命看作是英國社會特有的事，那是太不懂歷史發展的道理了，

是庸俗而且錯誤的看法。

在前篇中，我們已說明了：產業革命，是每個國家由封建社會進入現代社會時都會經歷的社會經濟大變革事件，都是把自身原有的封建社會體制潰解，並由其潰解過程中創製出的原始蓄積條件，作為其產業革命的基本前提。一個國家自身的封建社會體制如果沒有潰解，即使有外來技術條件輸入，也不會促成產業革命的發生。同時我們又指出：封建社會體制的潰解，即使創製出了原始蓄積條件，但那些原始蓄積條件在尚未構成新經濟體制的質素之前，遭遇到內在的或外來的原因而損耗了；或者形成了新經濟的質素而得不到其他護育的新社會諸條件相配合，那即使發生了產業革命，亦會受到挫抑而難以順利完成，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畸形變態。我們要瞭解各國產業革命有先後遲速正常與不正常之別，祇有從這些方面去考察探究，才能明白其所以然的由來。

一般說來，一個國家封建社會體制潰解得愈早愈徹底，原始蓄積愈豐滿，其他需要的社會諸條件愈齊備，它的產業革命也會愈早發生，愈能順利而正常的發展和

完成。否則結果相反。英國首先發生和首先完成產業革命，而其發展又能表現出最正常最典型的歷史發展樣本。祇有從這些方面去考察，我們才能明白英國之所以成為產業革命「祖國」的原由。

研究過英國近代歷史的人都會知道：英國的封建莊園制度，在十四世紀五十年代即動搖了；到了十五世紀以後，莊園的封建經濟體系即告消滅。城市手工業基爾特行會，到十六世紀以後亦逐漸解體。這些封建經濟體系的潰解，商業資本發展活動不用說是一大功臣。因為自十四世紀初，意大利所屬位於地中海諸城市與德國北部波羅的海區「漢撒同盟」諸城市之貿易，由於大陸交通受諸侯領主勢力之阻撓，而移向於大西洋水上交通聯繫後，英倫三島便成為商業資本活動區域上的一個中心站。後來南北兩商業區衰落後，商業活動更移向於北海和大西洋區域。加之十五世紀末新大陸發現後，歐洲各國商業資本在海外的競爭發展，更把英倫三島幾個主要城市變成商業資本進出活動的總站。雖然在這期間，西、葡、荷幾個國家在海外殖民地的劫掠先於英國，但由於那些國家內在條件的脆弱與對殖民地經營方策的

欠善，在相續和繼起的競爭過程中，終被英國所擊倒。一七六五年荷蘭的「無敵艦隊」被英海軍打垮後，英國便掌握了海上的霸權。上述幾個國家海外的殖民地，也相續被英國所攫取。這對於英國商業資本活動的擴拓發展，與對殖民地直接掠奪而形成原始蓄積的物的條件，是非常豐裕的。

英國的原始蓄積，不獨物的條件（即資本）非常豐裕；而且人的條件（即活勞動出賣者的工資勞動者）亦非常充足。因為在十六世紀，英國的手工製造業，雖然還落後於尼德蘭；但尼德蘭手工業（尤其是毛織業）的發展，使生產羊毛成爲當時英國最有利的作業。在這種利益的激誘下，便促成了英國近代史上極有名的圈地運動，即貴族地主們把大量的肥沃農田圈劃爲牧場，畜養羊羣；而把成千成萬的農民驅出田園，變爲無家可歸的流浪羣；也就是有名的「羊吃人」故事。這種圈地運動，雖然是喪盡人道的殘酷措施的大悲劇，但它對於後來英國資本家生產方法的產業之發展，亦即一般人所說的「產業革命」，顯然是發生極大的助力。因爲它充分提供了原始蓄積的人的條件。有了這「產業預備軍」人的條件，配合着前述的原始

蓄積巨量的資本條件，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自然很快的蓬勃發展起來。加之英國位處海上，與歐洲大陸隔了一個海峽，當時還沒有空襲轟炸的破壞威脅。所以在大陸諸國所進行的一連串戰爭，英國未參加的，固然沒有受到影響；就是參加的，她有強大的海軍自衛，亦未受到戰事直接破壞而耗損其原始蓄積條件，並且還得到不少利益：那就是大陸諸國許多富有企業心的富翁資本家和製造業熟練技術人員，在本國戰爭和宗教的迫害下，相續移居或逃入英國。這對於英國產業發展是大有助益的。同時英倫三島河川交通與水利又極方便，煤鐵礦產之蘊藏亦很豐富，這些自然條件，都有利於英國產業之發展。英國之所以首先走上產業革命，從上述諸條件加以考察，也就不難明白其由來了。

英國首先走上產業革命，而且很順利的首先完成，除上述經濟方面諸條件的首先獲得且很充裕所促成外，政治上的護育條件，亦居於很重要的地位。這是我們考察任何一個國家產業革命所不可忽略的。

英國早在十三世紀，國王便在貴族市民的壓力下設立了國會〔巴力門〕Par-

liament)。國會分上下兩院，上議院的議員都是大地主貴族及朝廷大臣，下議院則是由市民中小貴族和一部分農民代表組成的。下議院有決定各種賦稅法制及通過徵稅案之權，所以它的權力和作用，比上議院大得多。從十六世紀以來，市民的議員在國會中便逐漸佔有決定的地位，他們是代表全國納稅人（主要是工商業者）的利益，從而國會便成爲市民階層與國王所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主要場所。國王要橫徵暴斂，代表納稅人利益的議員，自然要強烈反對；這就造成國王不斷解散國會不斷重組國會的鬥爭事件。

查理一世（Charles I.）是一位有名的橫徵暴斂的專制魔王，在被統治的人民遭到殘酷的剝削壓抑下，便激起了人民武裝行動的革命。經過相當時期的武裝革命鬥爭，終於在新興市民資產階級代表人克倫威爾（Cromwell）的軍事領導下，於一六四五年第一次獲得了空前大勝，打垮了反革命的王黨軍隊，後來並活捉了查理一世。封建國王統治政權被推翻了，而以克倫威爾爲首領建立了共和政體，查理一世被判處死刑而送上斷頭台。「君權神授」說的實踐者和發揚者，便是這樣下場的。

由此，英國新興市民資產階級便掌握了政權。

克氏死後，斯圖亞特朝 (Stuart) 雖然復辟，查理第二再做了皇帝，而它的權力却受到了限制；一六七九年人身保護法案 (Habeas Corpus 有的譯爲出庭狀議案) 在國會的通過，對民權的保障確有很大的歷史意義。但詹姆士第二 (James II.) 即位後，又企圖恢復專制主義，結果沒有實現，終被代表工商資產階級的輝革黨 (Whig 卽日後的自由黨) 和代表大地主貴族的托利黨 (Tory 卽日後的保守黨) 相互妥協下，把威廉 (William) 親王從荷蘭接了回來趕走詹姆士第二，這就是英國史上被稱的「榮譽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威廉登基後，國會便提出了權利法案 (Bill of Right)，由新國王批准。根據這法案，國王權力大受限制，國會的權力提高到足以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支配政府的政策。自此以後，代表工商階級的自由黨和代表大地主貴族的保守黨 (後來變爲主要代表大資產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的政黨) 更迭掌握政權，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澈底勝利了。

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擊倒了封建勢力，自然也是由於封建政治勢力所依

存的封建經濟基礎的潰解作前提條件的。但新興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所採取的許多立法措施，加速了封建殘餘勢力的潰解，而扶植了自己集團經濟利益的擴展，實爲不可抹煞的事實。一六五〇年克倫威爾派軍征服蘇格蘭的反抗之後，即統一了全國。一六五一年頒布的「航海法」，以國家全力推進海外擴展事業，這對於英國商業資本在海外原始累積，是有力的扶植。一六五三年召集的新國會，也通過了好些有價值的法案，如取消什一稅，削減了封建的剝削。禁止地主保留三分之一以上的不耕種土地，一切空地都須供給農民耕作。這樣大大的擴拓了農業上的耕地，增加了農產品，原料糧價格的降低，對於英國工業的發育，大有助益。

由於上述社會諸條件充分的提供，英國的產業資本，便昂首向前尋找擴展的方術了。這方術便是技術條件的改進。英國的發明家，便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造就了他們的天才，一連串的發明便出現了。這些發明是適應當時英國產業部門要求的。棉織業是當時英國一種新興的企業，它不獨沒有受到殘餘行會制度的束縛與政府的限制，而且又比較集中，便於應用新式機具。加之原料供給又較先發展起來的絲織

業和毛織業爲充足而便利，成本低，銷路又好，故未幾即將絲織品與毛織品的市場奪取過來，獲利亦較豐。但由於印度殖民地輸入的棉織品成爲當時英國本土棉織品的一大勁敵，棉織品企業家爲充實自己競爭力與適應市場擴大了的要求，不能不積極設法改進技術條件，提高生產力，擴大生產規模，從而產業革命在生產部門的變革猛進，便首先由這個部門發軔。

一七三〇年，韋亞特(Wyatt)首先發明了「轉軸紡紗機」(roller spinning)，應用這種機具，即使婦女兒童亦能生產更多量的棉紗。這一技術的改進，又迫誘織布工具的改進。否則織布部門不能配合，儘管紗大量增加了，仍不能達成大量生產棉布的目的。終於一七三八年約翰·開(John Kay)發明「飛梭」(flying shuttle)；使用這種「飛梭」，生產力也可提高兩倍，且能使布的闊度增寬。他的兒子羅伯特·開(Robert Kay)更將「飛梭」進而改良，發明上下自動的「抒箱」(drop-box)，從而織布速度與產量大大增加。這一來，又引起紡紗錘改進的迫切需要；否則紗多而不能迅速的提供到織布機上去織，則仍將限制織布機可能發揮的生產力。一七六

四年織匠哈格里夫斯(J. Hargreaves)便發明了「珍妮紡錘機」(Jenny 是他妻名，據傳哈氏一天歸家，不小心一脚把妻子正在紡紗的車撞翻在地上，仍能繼續旋轉，他因此獲得啓示，用一條紐帶的幫助以一個紡車運動多個紡錘，最初模型機可容八個錘，到他死前已增加到八十個)。但「珍妮機」紡出來的紗，質地不佳，且不耐用，亦不美觀。一七六八年由一位理髮匠亞克萊特(R. Arkwright)就韋亞特的轉軸機加以改良而發明了「水力紡紗機」(water frame)，但仍美中不足，祇能紡粗紗。至一七七九年，又由克勒普東(Crompton)發明了「綜合精紡機」。這機是綜合「珍妮機」與「水力機」的優點而成，好像驢馬合交生的騾一樣，故名「騾機」(spinning mule)。這機能以最高速度生產粗細兩種紗。

但紡紗機突進，織機又落了後，形成不平衡發展。一七八五年終有卡特萊脫(E. Cartwright)的「力織機」(power loom)發明。隨着又有約翰生(Johnson)完成製造精巧布匹的自動機。至此，一個織工可產四十倍於前的棉布。然而織紡等機雖已配合改進了，但動力是依賴水風等自然力和畜力。畜力有限，不够充分提供機

機所需要的動力；水風自然力又受地理和氣候所限制，不便經常充分使用，故動力的改進成爲迫切要求。這便引起了瓦特（Watt）蒸汽機的發明。

瓦特於一七六五年，改良留孔門（Thomas Newcomen）的蒸汽抽水機，發明了「單動汽機」，並繼續改良，終於一七八一年製成了「複動汽機」，正式完備的蒸汽機才產生出來。從一七八四年以後，各紡織廠都相繼採用。動力供給的問題也解決了。

一七九三年美人輝特尼（Eli Whirtney）又發明了「軋棉機」（cotton gin）。這發明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種「軋棉機」大量的軋棉（每個工人用此機產量較前增加百五十倍），則前述各紡織機器都會受限制而不能充分發揮生產力。所以這發明是把輕工業的紡織業全部機器體系完成了。隨後還有荷魯克斯（Holtcks）「調整機」和「畫眉機」以及羅伯特（Robert）「自動綜合機」「旋轉紡紗機」等相繼發明。故到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紡織業完成了空前大變革。這些新式機器隨即擴展到絲、毛、麻織業等部門，以輕工業爲重心的英國第一期產業革命，即告完成。

由於輕工業的激進發展，以鋼鐵業爲主的重工業，必然要隨之發展起來。因爲輕工業本身不能製造大量鋼鐵機器，所以它所需要的機器工具必須重工業部門供給。加之商品經濟日益發展，交通運輸工具急需改進，這些都得以鋼鐵工業之發展爲條件。

早在一七三五年，達比(Darby)曾有煤熔鐵的發明，生鐵量是增大了，但熟鐵却不能大量鍛鍊。一七六九年瓦特改良了留孔門的引擎，使燒木炭的熔爐增大了熟鐵的產量，但仍不够需要程度。直到一七八三年科特(Cort)發明以生煤混合氧氣的熔鐵法，熟鐵產量才大大增加。在此期間，並有翰齒曼(Huntsman)精鍊鋼法的發明，以及安全燈和蒸汽機的普遍應用，使鋼鐵業獲得更大的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貝塞麥(Bessemer)等更進而發明各種最新的鍊鋼法，鋼鐵工業更驚人的發展起來。這種鋼鐵工業的發展，交通工具的發明，不僅有了便利條件，而且有着更需要的條件。在特爾福(Telford)等建築路床技術改進的先導下，一八一四年即發明了火車頭，鐵道交通工具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即在英國出現。水上交通工具亦由美

人富爾敦 (Fulton) 把英人菲赤 (J. Fitch) 一七九〇年首先發明的汽船加以改進，終於一八〇七年完成了汽船製造，而使水上交通運輸發生巨大變革。故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重工業爲重心的英國第二期產業革命，亦宣告完成。

在上述的英國工業激劇的突飛發展過程中，農業部門亦起着大的變革。自十六世紀所展開的圈地運動，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進行得更爲大規模而積極。廠地的耕作法差不多完全廢除，十九世紀初，科學的排水法，人工施肥法，以及機器耕作，都相續普遍採用。雖自一七七六年以後，由國外輸入的農產物逐年增加，但那不能看作英國農業沒有配合工業現代化起來，祇是英國農地在三島之上面積有限，且其生產在收穫遞減法則拘限之下，不可能像工業部門那樣累進的投資，累進的擴大農業生產，從而糧食原料不够工業部門激速發展上的需要，不能不由國外大量輸入。同時，從許多事實也反映出農業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擴展，圈地運動所圈劃的土地，不僅是把封建土地佔有關係破壞了；而且無論所圈劃的土地是作爲牧場抑或是作爲農場，都是大量的單純的爲交換的農業商品生產經營。

一八一五年所通過的穀物條例 (Corn Law)，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主爲提高地租而訂立的，並不是封建性的地主佔有下的土地關係要求提高封建貢納所造成。關於這點，我們從大經濟學家里嘉圖 (D. Ricardo) 所闡明的地租法則，即可明白。里嘉圖強烈的攻擊穀物條例也正反映他那代表資本階級利益說話的身分。這條例終爲「反穀物條例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 的鬥爭所打倒，而於一八四六年廢止了。

此後英國的國際貿易，差不多全爲亞丹·斯密 (Adam Smith) 的自由放任經濟學理所指導。而在金融業方面，同樣配合發展起來了。有名的英格蘭銀行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即成爲英國資本家經營貨幣資本的國內外總機構。所以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不單是完成了極典型的產業革命，而且由此首先跳上「資本主義王國」的寶座。這不用說是內外有利條件造就了她的地位。其他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產業革命這社會的大變革上，就沒有像她這樣順利，這樣典型。但也無一不是把自己的舊社會體制變革過來達成的。舊社會因素清除愈未澈底，產業革命也愈不順利，愈

招致或造成更多的禍患。此中原因，下面我們進而分析就可明白。

二 法德日俄美等國是怎樣完成產業革命的

繼英國之後而首先走上產業革命的國家，是歐洲大陸的法國。她雖較英國落後約半個世紀，但却跑在其他國家之先，而居於產業革命時間進程上的第二名。

一提到近代的法國，很易使人立刻想起一七八九年七月巴黎成千成萬的羣衆攻破監禁政治犯的巴士底(Bastille)那壯烈偉大的革命巨濤，和路易十六那位專制魔王死在斷頭台上那一樁極富有歷史意義的悲劇。也許由於法國近代史上這種社會變革表現在政治鬥爭事態上特別顯著的緣故吧，致使她的產業革命隱蔽而不太被史家作專門紀敘；加之法國產業部門之發展變革，又是移植了英國的技術條件，這就愈顯得法國的產業革命好像沒有自發的表現出來似的。也無怪祇着眼於表象的史家，沒有把產業革命當作法國社會必然自發的事件來理解。

然而我們從科學的歷史觀的視野去考察，法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資本主義社

會的發展過程諸具體史實，那你就會明白法國產業革命其所以落後於英國，是有其自身歷史社會的原由所在。

研究過中世紀歐洲史的人都會知道：法國不獨是中世紀法蘭克(Frank)王國封建版圖中的直裔地盤和「神聖同盟」(Holy League)的出生地，而且是整個中世紀歐洲大陸各大規模戰爭廝殺的中樞，加之封建貴族腐化奢侈生活又爲歐洲之冠，巴黎皇宮之綺麗豪華場面至今猶令人目眩，就是一種很鮮明的標幟。在這樣歷史環境下的法國，它內在社會生產力之發展與原始蓄積進行，自然是受到了遲緩的影響，從而封建制度的解體也落後於英國。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法國的農奴制度雖已逐漸解體，資本家生產方法也有萌芽；但直到大革命前夜，農奴仍是構成法國農村人口的重要成分，封建的寄生階層還是強烈的支配着，居於生產手段中主要地位的土地，有五分之一屬於國王，五分之二以上屬於教會與貴族，佔着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廣大農民所佔有的土地是非常微少的。封建統治階層所佔有的廣大土地，並不像英國發生過圈地運動開闢大面積經營，都是劃分得很細塊的給農民耕作，地租

之高那是不在話下。國王僧侶貴族爲着不斷擴大其奢侈的腐敗生活，不僅把自己佔有的土地作爲直接剝削廣大生產羣衆的工具，而且還用其封建特權，實行種種超經濟的剝削，使廣大的農民層經常陷入饑餓與死亡的邊緣。

在這種生存的嚴重威脅下，成千成萬的農民羣衆，也就經常起來反抗暴動，造成農民革命在法國歷史上很大的篇頁；而新興的市民階層所受到的苛捐雜稅之剝削壓抑，也不亞於農民，使其經濟利益無由獲得抬頭的機會。雖然自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法國的新興市民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在某些方面取得暫時的妥協（各商業資本侵入農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出賣或抵押於新興資產階級），但兩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因爲在舊制度胚殼中勃興着的資本主義生產，到底是不能與包圍在外的封建勢力相容。封建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像鐵鉗似的扼壓着，使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無由發展，增大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負擔，於是新興的富裕市民羣，對舊制度便強烈的要求推翻，以新興資產階級作領導，而聯合農工羣衆反封建統治爭民主自由的革命洪流，終於一七八九年澎湃的掀起了萬丈浪濤，把法國的封建社會

諸般因素，連根拔洗了。

大革命的巨浪雖然把法國舊社會制度清洗了，新興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但法國的新興產業並沒有立刻發展起來。這原因固然很多，而主要的我們却不難指出：在大革命內戰中所造成的破壞所消耗的原始蓄積是相當巨大的，革命勝利果實，全被資產階級所吞食，他們把從封建國王貴族教會所沒收得的土地財產佔爲己有，並且把土地很零碎的劃分出賣於農民。這雖然增大了新興資產階級原始累積的資本條件，但却妨礙了大規模農業發展與市場購買力，和提供工業部門活勞動力的限制。在拿破崙崛起的期間，雖然也使法國獲得了不少的掠奪侵佔財，但拿破崙的失敗（一八一五年），不獨掠奪侵佔財都喪失了，而且還折了老本，賠了不少款；殖民地和市場，也被英國佔去了；直到復古王朝（一八一五——一八三〇年）法國的產業才蓬勃的發展起來。

在復古王朝期間，法國產業迅速發展起來，一方面固然由於法國社會已趨安定，大陸封鎖解禁（一八二五年）；英國技術獲得輸入，給予助力；但大革命對舊

社會因素的澈底清除，仍為最重要的基本原因。否則，短短三十年，且在戰爭不斷消磨之下纔告安定，也不可能立即使產業獲得迅速發展的機會，這是值得認清的。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在法國政治上雖無多大變革，但對於法國產業發展上，卻獲得了較大的推進。因為路易·斐利浦（Louis Philippe）是在金融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擁戴下而登基的（他自己也是個金融資本家），故他的統治等於金融工商業資本家的統治，也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進一步的勝利。在他統治的十八年間，法國產業更飛躍的發展了，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產業革命也就大功告成了。

其次，我們來看德國的產業革命吧。

當英國行將完成第二期產業革命，法國亦已踏上產業革命歷史行程的十九世紀初葉，德國還是完全處於封建舊殼裏的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造成德國的落後與散漫是有許多的歷史原因：漢撒同盟的崩潰，國內戰爭與宗教戰爭的頻繁，封建諸侯的跋扈，以及政治經濟的割裂，都是妨礙了德意志走向經濟繁榮與政治統一的重要原因。維也納會議（一八〇三年）以後德意志諸小邦雖然合併了形成三十六個較大

的邦國之德意志聯邦，但距形成中央集權的民族統一國家還是很遠。聯邦組織本身就非常脆弱，不能行使多大權力，干涉各邦內政。聯邦的結合極爲勉強而鬆懈。而在拿破崙鐵騎佔領的影響下，雖然也把德意志諸邦的封建體制大大震撼而動搖了，並由此而引起自上而下幾次農奴解放的措施（從一八〇七到一八二五年共有四次有關於農奴解放的法令頒佈），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幼芽在封建的罅隙裏獲得一些成長的機會。但是那些措施，極不徹底。農奴身份解放，在贖身金的壓榨下，經濟生活並未獲得改善。農奴祇是變爲身份較自由的債農而已。所以德國已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仍無法獲得較良好的發展機會。加之拿破崙垮台之後，大陸封鎖解禁了，英國的商品像潮水般的湧進來，使德國新興產業的幼芽，不獨受內在封建因素的束縛，而且還遭外來力量的絞殺。這把德國新興資產階級陷入了極端困厄的苦境。有名經濟學家李士特（List）內倡統一，外倡保護關稅的大聲疾呼，就是很鮮明的反映。

李士特的呼喊，總算沒有白費氣力。一八三四年以普魯士爲首而組成的關稅同

盟，得以成立。這對於德國近代歷史確是具有有一種劃時代的意義。它雖然還沒有把德意志各邦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民族統一國家；但各邦間關稅壁壘的撤除和對外所採取的保護政策，對於產業資本的發育滋長，却是一種頗為有利的條件。所以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便以較大的成長速度向前發展起來。有的史家把一八三四年的關稅同盟看作是德國近代史的里程碑，也不無理由和根據。

然而德國的產業資本在上述的條件下，雖獲得一點發展機會，但並沒有擺脫封建因素的束縛；因為前述各種變革措施，並未把德國的封建社會體制澈底摧毀。各邦的政權仍為封建貴族地主所把持。廣大的農民仍在封建勢力壓抑下翻不過身來。新興資產階級自己仍未取得政權的支配地位而無法伸展其經濟利益。這就造成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由來。

但是，這次革命，雖然是由新興資產階級所領導，而勞動大眾在革命中的行動却非常有組織，英勇地到處襲擊封建貴族地主階級。也正因為勞動階級在行動上表

現了這種英勇的戰鬥精神，革命一開始就把領導的資產階級嚇軟了。他們怕勞動階級佔取優勢，將有不利於資產階級的地位，於是在革命行動上軟化了而採取妥協政策。同時，封建貴族地主階級，他們也深受法國大革命流血恐怖所教訓。所以當革命爆發之後，很快就採取了狡猾的讓步。在資產階級的妥協與封建統治者的讓步下，便於五月間在法蘭克福（Frankfort）召開全德國民大會。這大會不用說是自由資產階級操縱的，它並沒有宣佈自己為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機關。國家的最高權力依然是操於代表國王的聯邦公會。後來國民大會編訂了全德意志憲法，決定以普魯士國王為德國世襲皇帝，但這憲法事實上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國民大會空忙了一陣就煙消雲散了。所以這次革命被科學社會主義創立人稱為「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反動勢力並沒有被擊潰，封建的專制政權依然存在，貴族地主的特權，依然保留。廣大農民並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的束縛。全德意志在政治經濟上尚未完成統一，祇是部分的割除了封建義務和行會制度的勢力。德國資本主義經過這次革命的滌盪，雖然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機會，但究由於封建殘餘因素遺留過多而無法正常

順利的發展，以致造成德國走上反動的軍國主義途徑。因為國內人民在殘餘封建勢力壓抑下而無法改善生活，商品生產所需要的市場購買力條件就非常狹隘，而國外市場又早為先進國所佔據，這就迫使了德國產業資本家把資本投向軍需工業的發展，藉武力向外衝，來掠奪殖民地資源，以補充其先天不足的原始蓄積。這企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果然如願以償：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德國勝利了，它不獨由此而實現了全國統一，而且還得到了法國大量的割地（亞爾薩斯和洛林）和賠款。這對於德國產業革命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完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促成因素。但在封建因素極濃厚的社會基礎上靠戰爭起家，必然又會把戰爭當作主要手段來遂行其擴展。德國首先走上帝國主義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與德國產業革命未能正常發展是有極密切的關係，也是值得我們認清的。

與德國產業革命那種不正常的發展極相近似的是日俄兩國，也都是封建因素未徹底掃除的社會基礎上來進行資本主義化的產業革命。為着說明上的便利，我們先談日本的產業革命。

近代日本史上在外表顯現着很大的變革，是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有許多史家都把它看作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出發點。其實「明治維新」祇是藩閥分權割據的領主封建轉變為中央集權的官僚封建，並不是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次「政變」在各主要的部分中都沒有新興資產階級與農工羣衆參加，領導變革的主體是薩、長、土肥等強藩；在離藩「志士」的指導下，獲得了豪商豪農的贊助，把政權歸還於封建國王，實現了封建統一局面。所以明治維新政府中，新興資產階級並未獲得任何政治權力。從而在明治維新時代所實現的各種改革中，資產階級的改革並沒有能佔據支配地位；封建性的領有形式仍然保存，諸侯與農民間的「五公五民」以至於「八公二民」的貢租，都仍然原樣的由新政府所繼承。所以明治維新根本還不能與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同等看待。祇是封建政治上的「維新」，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

但這並不是說明明治維新對於日本社會經濟毫無影響。因為這種政變把各藩閥封建割據的場面結束了，實現了全國統一；這對於商品經濟的活動發展，自然較以前

藩閥割據時代爲有利。加之列強外來商品勢力的侵凌，使日本封建的官僚統治階層，不能不急謀自己國家產業的發展以資抵抗。於是明治政府便利用上述那些封建性的貢納，一方面給養各級封建官僚，一方面則用以培植新式產業，作爲補助國內原始蓄積之不足。爲着打開一條產業發展的路，對於封建的農村土地佔有關係，不能不加以人爲的某種程度的改革，從而便有明治五年到八年，有關土地改革的幾次措施。明治五年（一八七二）二月解除買賣土地的禁令，明治六年頒布「地租改正」，即將國賦以土地爲對象而徵收，並令以貨幣代實物繳納；明治八年五月又解除限田法，准許土地自由分割、兼併、抵押、租佃。這些措施雖然沒有把農村的封建剝削完全剷除，但農民的人格身份自由了，並由這種解放促成土地迅速集中，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耕作機會，而變爲低廉的工資勞動者，提供了原始蓄積人的條件。而「地租改正」，不獨用人爲的措施把大量的農產物變爲商品（因爲任何農民繳納國賦都得把農產物出賣變爲貨幣），有利於資本家生產方法的發展；而且政府國庫收入大爲增加，可用此種收入來興辦或獎勵津貼新式企業。日本官營企業從此大量出

現了。日本現代式的企業可說是從此開步向前走。

但究由於一切改革措施，沒有把封建剝削完全撤除，人民生活無法獲得改善。這就造成了日本一走上現代化，即遭遇到國內市場購買力極端低弱的矛盾。正由於在封建因素大量殘留的社會基礎上來進行產業化而缺乏了國內市場的擴展條件，國外各落後國市場又早被先進國所奪佔，這就迫使日本產業像德國一樣，不能不走向軍需工業發展途徑。軍需品生產固然不像一般商品那樣生產週轉需要通過市場的商
品買賣來擴大生產，但却須要通過戰場來消費它，並且還要藉戰場的勝利掠得國外市場和原料，在資本制的生產上才有實際意義。這就造成日本和德國一樣，在產業革命展開後沒有經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而立即跳上帝國主義階段：靠對內壓低國民生活水準，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掠奪殖民地原料和市場來補充其先天不足的原始蓄積。甲午之戰（一八九四—五年）與日俄之戰（一九〇四—五年），竟如願以償。這兩次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完成了產業革命，同時也就擴展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日本成爲遠東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溫床。祇有從日本在封建殘餘因

素極濃厚的社會基礎上進行產業革命這事實去考察，我們才能明白其必然的由來。

現在我們再看俄國產業革命吧。

一提到近代俄國的產業發展史，很容易使人連想起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這位俄羅斯的歐化先導者。說來真是有趣，以一位身為封建君主的皇帝，爲了國防與軍備而謀求俄國產業的發展，他曾於一六九一年親赴西歐先進國工場裏學習各種進步的製作技術，回國時還聘請一批熟練的技術人員和購置不少較進步的工場設備弄回俄國來着手創辦了好些製造工廠。但當時俄國還全是農奴制度所支配的社會，農民佔全國人口最大比重，他們被土地所束縛而毫無自由，以致工場裏所需要的勞動力大感不够使用。爲了克服這種困難，首先是將逃亡的農奴、流浪者以及乞丐等無業流民編成隊伍，投入工場；但仍不足應用，於是便有一七二一年有名的「彼得飭令」的頒布，把農奴用鞭子驅進工場，並准許農奴可以自由買賣。這樣，封建貴族地主也大量買入農奴興辦工場製造業。同時，彼得大帝還想出一套吃人的新花樣，那就是有名的「人頭稅」的課徵。這一來，不獨廣大生產階級的農奴男女老少

要繳納苛重的捐稅；就是流氓乞丐，寺院的僕役和家內奴隸，也通通變爲課稅的主體。廣大人民的生活，完全陷入了非人生活的黑暗地獄。致使俄國的農奴生活，並不比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生活優越。這樣的來促進工業發展，不獨未能實現理想中的企願，而且導來了層出不窮接二連三的農奴暴動。儘管每次農奴暴動都被用殺的政策戡平了，然而社會經濟基礎，却愈弄愈衰萎了。「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四—六年）的慘敗，便把俄國這種農奴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於是農奴解放便成爲俄國社會經濟能向前推進的契機，一八六一年所頒布的農奴解放令，便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促成的。

由上而下的農奴解放措施，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相當合理；不獨給與農奴以自由民的地位，並且還分與一部分土地。然而實際上祇是把農民由農奴身份改變爲債奴身份而已，因爲農民獲得的土地要支付賠償金或土地收買金給地主。不然，土地仍不能成爲自己所有物。在未支付收買金之前，仍須爲地主負服徭役、納年貢，雖然在農民不能支付收買金時政府代爲付與地主，由農民分作五十年按年分還國

家，但付與政府代還的地價比市價爲高。各農民戶口被編成農村公社的「密爾」(mir)，同「密爾」各社員，在支付地價上負有連帶的責任，即由公社全體農民共同負債。這樣，任何農民不得隨意離開公社的組織，「密爾」成爲農民繳納租稅與土地收買金的集體負責單位。所以這樣的「解放」，完全是農奴制度的再版。廣大農民仍然在封建殘餘的壓抑下翻不過身來。

但這種「解放」措施，並不是說沒有對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起着影響。誰也不能否認，自一八六一年以後俄國資本主義獲得了較大的但却是不正常的發展。因爲在解放後的農民變爲債農，這就給商業高利貸資本以有利的剝削機會。而不少農民在多重剝削下，是無法在那塊分與地上生存，寧願拋棄那片土地逃出「密爾」，以廉價出賣勞力，轉爲工資勞動者。另一方面，貴族地主由土地出賣所獲得的大量地價資金，紛紛向企業投資，尤以交通機構的鐵路建築投資爲多。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交通建築迅速展開了，它反轉對於其他企業的發展，自然是一大刺激。加之俄國政府還大量的向外國借款用來轉貸與各企業經營者，並且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以

扶植國內產業，所以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的產業資本已大致確立。但由於是在半封建的社會基礎上來進行產業革命，既無大量殖民地，又缺乏國內市場條件，因此必然要同德國日本一樣偏重於軍需工業發展，靠戰爭向外掠奪市場和原料。一九〇五年的日俄之戰，便是俄國西向擴展不易，而轉向遠東擴展時碰上了同類型的日本；兩隻餓虎狹路相遇，必然要互相咬鬥一場。可見在封建殘餘的社會基礎上來進行產業革命，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很快走向侵略主義的途徑。

最後，我們還要把新大陸的美國產業革命加以介述。她的產業革命所具有的具體歷史條件，與德日俄等國固然不同，而與英法兩國亦有差殊，可說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類型。

大家都知道自十五世紀末葉哥倫布（Columbus）發現美洲這塊新大陸之後，原來尚處於原始社會中期的土著民族，便逐漸為白種人殖民者所征服，而變成歐洲白種人逃亡客與宗教被壓迫者的新天地。由於這塊新的天地自然經濟條件的富足，由歐洲跑去的開墾殖民者，很快就成為新富翁。這又大大的引誘了歐洲人士大量的移

居過去，尤以英倫三島在政治宗教上被壓迫前往者最多。自十七世紀英國在北美殖民政策獲勝之後，到十八世紀中葉，北美東岸一帶地方便建立成十三州的殖民地，成爲英國海外殖民地中最肥沃的地盤。當英國產業革命展開之後，它已成爲英國產業發展上原料供給的主要地域之一。在英國殖民政策統制下的美國人民，無論是豪農地主，抑或是工商業資本家，他們的利益都受到極大的壓抑，從而爭取獨立解放，便成爲他們的迫切要求，由是而激起了獨立戰爭。一七七六年大陸會議發表了有名的獨立宣言，宣稱一切人類生來平等，人民有推翻暴虐政府重新組織代表民意的政府之權，隨即宣告脫離英國而獨立，組成北美十三州的「合衆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獨立戰爭亦隨之爆發。

在極複雜的國際環境和美國爭取獨立解放的人民英勇鬥爭下，經過了數年的戰鬥，終於一七八三年獲得了最後勝利，英國承認北美合衆國完全獨立。這勝利不單是美國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展開了新的活躍姿態；「保護關稅政策」的實施與「西漸運動」的擴拓，使美國的產業尤其是北部諸州的產業獲得了長

足的發展。但這一來，又引起了內在矛盾的日益尖銳。這種矛盾，雖然不像其他國家基於傳統封建因素所造成，但却是美洲式的奴隸制度與其新興的工商業資本發生在地域上不能調和的矛盾所使然。

因為美國南部各地的豪農地主，其經濟利益，是建築在使用黑奴大量種植原料（尤其是棉花）的生產基礎上。當時南部原料生產的勞動力，是靠從海外賣進歐洲人在非洲逮捕的黑人，當作奴隸來使用。而生產出來的原料，反以販賣給英國為主。要貿易對象。從而南部的豪農地主，在經濟利益上不獨要維持自由貿易，反對保護關稅，而且要繼續保留和擴大奴隸制度。但在北部工商業資本家的利益要求恰恰相反；他們為着較幼弱的新式工業順利發展，不獨須要採取保護關稅政策，而且須要廢除奴隸勞動制度。因為使用奴隸，於資本家工業生產上是不利的，它是需要自由的工資勞動者，美國在當時又是缺乏活勞動力的國家；自西漸運動擴展開後（即大量向西部太平洋沿岸各州移民墾殖），使東北部各州勞動力更感缺乏，外來的勞動力，又被南部奴隸制度束縛在土地上，由是而造成工資騰貴，大不利於北部工業的

發展，因此而釀成了一八六一年至六五年的南北戰爭。

經過四年戰爭，北部勝利了，林肯的黑奴解放運動成了功，美國的資本主義得到確立和飛躍發展的機會。由於她的自然條件的豐厚和電力石油動力的首先應用，使美國的產業革命更能以驚人的速度和巨大規模迅速發展和完成。到十九世紀末，便一躍而為世界第一位的工業國，使其他先進國瞠乎其後。

*

*

*

*

從上面各國產業革命經歷過程的檢討，我們已可明白：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相配合，產業發展是不可能的。社會條件是靠把舊社會體制澈底變革才能提製出來的；沒有那一個國家在封建的舊社會基礎上順利的完成了產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正常的發展起來。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獨與各國走上產業革命的時間先後有關；而且與各國封建因素在產業革命過程中是否澈底清除有關。因此，我們要瞭解產業革命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帶給了人類怎樣的後果，不單要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結構去考察；而且還要從各國資本主義體制中所遺

存的舊社會因素成份所引起的作用去剖析，才能明白近數十年來國際上諸般大事態的由來。

三 各先進國產業革命造成了怎樣的後果

產業革命導來了怎樣的後果？這使人首先最易覺察到的，便是一般人滿口贊美的所謂「現代物質文明」。不錯，現代高度的物質文明，確是產業革命最大的光輝成果，因為它把勞動工具和生產技術大大的改進了，使勞動生產飛躍地擴大，自然力代替了人力作為生產的原動力，解放了人類的勞動生產不致受到他的天然器官的限制；自然限制人類和束縛人類的桎梏，在機械使用下被摧毀了，大大的提高了人類控制自然和改變自然的權能。以前人類想飛上天空、潛入海底、呼風喚雨、千里眼、順風耳，祇是神話小說中的臆說假想，事實上是辦不到的。現在有了飛機、輪船、火車、潛水艇、無線電、收音機、望遠鏡，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知識盡量應用，使以前的神話假說，現在都成為活生生的事實。鋼骨水泥的摩天洋樓，風馳電

掣的各種車輛，綺麗繁華，五花八門的裝飾排場，真是美不勝收，使人目眩眼花。這一切的一切，誰也不能否認它是產業革命帶給人類的豐富禮物，使人類從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並反轉來奴役自然，駕御自然。這顯然是人類對自然打了一個決定性的大勝仗，自然不再是人類的大敵人，而且變爲人類的俘虜了。

這勝利也並不是什麼上帝所賜與，而是人類自身勞動所達成的奇蹟。如果沒有直接生產勞動者創造出較多的剩餘生產物（即直接生產者維持自己生活必需的生產物之外而有多餘的那部分生產物），那不獨各種科學文化上的技術發明成爲不可能的事，就是偶而發明了，也不可能應用來創造現代物質文明的奇蹟。科學家是不可能不吃飯不穿衣在研究室從事發明工作的；發明了的原理方法或製成的模型，也不可能用魔術變化成各種生產實際應用的大規模工具。機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呀，而是由發明家發明之後，仍需大量直接勞動者去勞動製造出來。這道理是誰也明白的。由機器的擴大應用，和各種生產手段大大的改進，使勞動生產能力比以前能提高數十百千倍。每一個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生產物，也比例的增大了。其他各種社

會的事業才能在這種物質條件的基礎上大規模的興辦和發展起來。科學文化才能獲得長足進步的機會。科學文化大大的進步了，它反轉來又促進了人類勞動生產能力更進一步的提高，剩餘生產物更巨量的增加。現代的文明，便是在這種物質生產條件的基礎上被創造起來的。

然而上面所說的「物質文明」，還祇是就產業革命而成長的資本主義社會所表現的光明漂亮的一面，它另外還有着黑暗醜惡的一面；並且這難看的醜惡面，又是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擴展起來的。更明白的說，勞動生產經過產業革命而創造的現代高度物質文明，祇是少數人所享受；最大多數而尤其是這物質文明創造者的勞苦生產大眾，不獨沒有得到應得的享受，反而成爲這物質文明下的受罪人和犧牲者！他們創造了綺麗繁華的高度物質生活水準，而自己的物質生活水準反而愈低落了。他們創造了節省勞力的龐大機器，而自己反轉來又變爲機器下的奴隸。他們創造了裝潢精緻的洋樓大廈，而自己却是住着破爛齷齪的地窟，甚至在人家屋簷下，避風雨，度黑夜。他們創造了眩目耀眼精緻美麗的綾羅綢緞，而自己所穿

的，却是襤褸不堪的破爛衣服，甚至赤身露體聽任風雨侵襲。他們創造了山珍海味香氣撲鼻令人垂涎的豐美餐食，而自己却是常陷在饑餓境地，連殘羹剩湯的渣滓也不易嘗到。他們創造了空前無比的巨量財富，而自己却變成了赤貧如洗的窮光蛋。誠如亨利喬治（H. George）所說，「財富日增，貧困日深。」確是物質文明所產生的畸形變態。

這種勞動創造與消費享受的極不合理的現象，當然不是命也運也，而是社會制度所使然。前面我們會說到，在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任何人佔有了超過他自己勞力所能使用的生產手段；他不單是當作財富佔有着，而且是當作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來增大自己財富的工具而佔有着。從產業革命而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手段是由資本家階級所佔有，沒有或失去了生產手段的人們，祇好出賣勞動力來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由於是為生存而出賣勞力給資本家生產勞作，資本家就有了剝削勞動者所生產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的機會。而且也祇有靠這種剝削，他的財富或資本才能擴大的累積起來，他佔有着大量的生產手段對他才有意義。如果生

產手段佔有者的資本家，僱備大批工人來從事商品生產，工人在生產勞作上所創造的價值在工資形態上全部領了回去，那資本家就毫無所得，從而這種生產經營於他也毫無意義。世界上我們還沒有發現過不要利潤而經營商品生產的資本家。如果有話，那他一定是患了神經病，否則，他是不會這樣幹的。資本家的生產經營是為利潤，利潤就是勞動者在生產勞作中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轉化物，也就是從勞動者身上剝削而來的財富。資本主義社會勞資兩大階級的對立衝突，便是這樣剝削與被剝削造成的。

一般為資本主義利益辯護的御用學者，硬說資本家不是剝削階級。那末，資本家驚人巨額的財富從何而來呢？舉個實例吧，美國第一號大資本家石油大王洛克菲勒（Rockefeller），據專家估計，如果把他的全部財產鑄成中國的銀圓，移置於大西洋海岸邊，用一個人每秒鐘丟一塊進海中，從耶穌誕生那一天起到現在還丟不完，其數額之巨可想而知。比洛克菲勒財產略少一點的，在美國還有幾十家。這些大資本家並沒有三頭六臂，也無點石成金的妖魔鬼神通；不是剝削別人，如何能成爲

這樣的大富翁呢？

在資本主義社會，財富日益集中於少數大資本家手裏，正是大多數人民日益貧窮形成起來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階級對立衝突日益激化的必然由來。財富或資本日益集中於少數大資本家手中，是由商品生產經營自由競爭來達成的。商品經營競爭，是靠價廉物美才能發揮其競爭力量，排斥他人的商品，霸佔市場，實現更大的利潤。要商品價廉物美，必須擴大生產規模，採用更優良更能提高生產力的機器工具。這又祇有資本愈雄厚的資本家才能辦到。資本愈雄厚，愈能生產價廉物美的商品，愈能發揮強大的競爭力。小資本家既無法為敵，勢必在競爭中被淘汰下來，宣告破產，出賣剩餘的生產手段給大資本家，自己加入無產者行列。大資本家由此變為更大的資本家，小資本家由此變成更小的資本家，乃至失去資本家的身份地位。資本主義社會階層的兩極分化，勞動者無產階級的行列日益擴大，就是這樣造成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商品化。資本家用以生產的諸條件都要從市場買入，

而生產出來的商品，又要投到市場出賣。勞動者同樣也要把自己的勞動力賣出，爲別人生產商品，而自己所需要的各種生活物質條件，又要從市場買入。他出賣勞動力所得多少，決定了他能在市場買入多少；如果他在資本家方面所得的工資愈少，他在市場上購買資本家的商品能力也相應的愈小。這就形成了資本家生產方法上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爲資本家要獲得更多的利潤，不僅要減低工資，剝削更多的剩餘價值；而且要採用更優良更能提高生產力的機器。減低工資是直接削弱勞動階級在市場購買資本家商品的購買力；而愈是採用優良機器，愈是生產擴大，愈要相對的減少活勞動力，增加失業人數。由此愈促成工資水準下降，市場購買力縮小。這樣，資本家愈改良生產條件，愈擴大生產，便愈難賣掉所生產出來的商品。於是形成生產過剩，物價猛跌。資本家生產出來的商品愈過剩，價格愈下跌，他不獨無法實現利潤，而且無法繼續進行再生產，由是而解僱停業。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每一個經濟活動部門或單位，都是高度有機性的聯繫着，某一個部門或單位解僱停業，必然要牽累到其他許多部門或單位解僱停業，失業羣衆就會像潮水般的從各方

面湧流而出，泛濫整個社會秩序。資本主義無可避免的經濟恐慌，就是這樣爆發出來的。從產業革命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每隔八、九、十年，像惡性瘧疾似的經濟恐慌風浪，每每依週期性而襲來。一旦恐慌爆發，它使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陷入殭化癱瘓的白色恐怖境地，而且愈來愈深刻而沉重，物質文明賴以推進的生產技術條件，便受到這種社會制度內在矛盾的阻抑而無法改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亦由此而陷入停滯。

但上面我們的說明，還祇是就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在矛盾發展，必然要產生貧富懸殊，商品過剩，隨着就是恐慌危機，社會停滯等病症。如果僅是這些病症而不造出其他更大的悲劇，或者祇限於幾個資本主義國家本身，而不影響到全世界的人類，那倒不大要緊。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它的病害，不獨還要造成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大衝突，大殘殺，而且還要造成整個國際大衝突，大殘殺的慘劇。使整個人類不獨不能享物質文明之幸福，而且還要受物質文明殘酷的屠殺。近半世紀以來，整個人類所遭受的苦難，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面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必

然要被它所奴役的廣大人民羣衆所推翻，已成爲無可逃避的定局。

商品生產過剩從而招來經濟恐慌危機，這不獨促成國內勞動階級革命力量的日益膨脹；而且必然要促成自由資本主義經濟轉爲獨占資本主義經濟，從而造成向外以武力侵略掠奪的帝國主義和國際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因爲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內在矛盾而導來的經濟恐慌，勞動生產大衆的痛苦日益加重；爲掙脫此種痛苦，必然要起來展開英勇的革命鬥爭，打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枷鎖。資產階級爲緩和此種矛盾危機，在資本日益集中的條件下，勢必加強其獨佔組織，在某種場合上限制競爭，實行市場獨占控制價格，以求在獨占的控制下來確保利潤。各種形態的獨佔組織，以及通過資本階級自己所掌握的政治權力來推進獨占的統制經濟，由此出現。但獨占並不能消除競爭，並不能把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分配不合理而造成的國內市場狹隘性尖銳矛盾加以克服，祇是把個別資本家的單獨活動競爭，變爲集團競爭，把競爭勢力集中，從事更猛烈更激劇的競爭而已。從而內在的矛盾及其所造成的諸病症危機，亦即商品過剩，失業日增，更深刻而廣泛的恐慌諸

危機，仍無法避免，反而愈趨惡化。這樣，向外擴張掠奪殖民地原料和市場，便成爲各資本主義國家緩和內在危機以求避免加速崩潰的唯一途徑。

這種向外侵略掠奪的帝國主義行爲，表現得最積極最瘋狂，而且在整個國際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中首先起來張牙舞爪的，是那些產業革命發展得不順利不正常的國家。因爲那些國家在產業革命過程中，沒有澈底掃除其封建殘餘，各種封建性的剝削處處存在，使國內廣大人民的生活無法獲得改善的機會，從而它的國內市場條件也愈狹隘，愈容易使資本主義的矛盾趨於尖銳化，使國內勞動人民革命勢力愈容易擴張，階級鬥爭也愈易激化。封建因素沒有澈底清除，最主要是在土地佔有關係方面沒有澈底的合理改革過來，使廣大農民無法脫離封建殘餘的壓抑。他們的生產條件以及生活條件無法改進，不獨使資本家生產出來的商品在國內得不到較大的市場條件；而且使資本家生產所需要的原料在國內得不到充分供給。加之這些國家產業革命，在時程上又落了後。當她們進入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國外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又早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攫佔；要靠商品傾銷去競爭時，不獨

受先攫佔者關稅壁壘所阻抑，而且還因爲自己技術條件與生產力較爲低落，而無法藉商品傾銷去壓倒別人。可能採取的政策，祇有從事軍需工業的擴展，加強軍備，用武力戰爭去掠奪分割。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便是這樣釀成起來的。

在前面我們已說明到，資本主義幾個先進國家中，德、日、俄等國的產業革命都是沒有澈底清除封建殘餘而極不正常發展過來的。因此，這些國家產業革命一完成，甚至還沒有全部完成，未經過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即進入獨占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首先向外發動侵略戰爭。這事實，我們如果把近半世紀來的國際情形加以回顧，就非常明白了。

英國是資本主義第一名先進國，她的產業革命雖然經歷時程最長，但因爲封建因素清除得較爲澈底，故其產業革命的發展也極正常而順利。加之她擁有着海外廣大的殖民地，原料市場條件都較優越，所以她藉這些優越條件，得以緩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在矛盾的危機。從而她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祇是維護既得利益，而還沒有主動的來發動國際分割殖民地的戰爭。法國經大革命把封建社會殘餘因素掃

除得非常徹底，同時也還有點殖民地，所以她在產業革命完成之後，也還沒有迫切要求立即發動侵略戰爭重分世界殖民地。新大陸上的美國，完全建立在一塊新天地上面，沒有傳統封建因素的制束，自然富源又極豐裕，所以她不獨很順利的完成產業革命，而且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體制，在上述優越的自然條件下，具有着對內在矛盾發展較大的空隙。所以她經歷自由資本主義時程也較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她的帝國主義臉孔和行爲，才明確的表現出來。

但德日俄等國情形就不同了。

德國自普法戰爭勝利後，全國統一，且由於吸食戰爭勝利果實而迅速完成產業革命；但由於一八四八年革命未澈底清除封建殘餘因素，致產業愈向前發展一步，內在矛盾也愈激化起來。爲緩和此種日益激化之內在矛盾，向外擴張便成首要急圖。威廉第二上台而踢開俾斯麥之後，立即瘋狂地擴軍備戰，並喊出「未來的德國在海上」。這把霸佔海外的老大英帝國嚇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其所以成爲發動的禍首，正是有此必然的原由存在着。

俄國產業革命全是在封建妥協的解消下勉強促成起來的。而在產業革命還未全部完成時，內在的矛盾已促使她早熟的變成了帝國主義。羅曼諾夫政權也和威廉第二政權一樣，原想以軍事力量達成向外擴展，緩和國內反統治的革命勢力之脹膨。向西擴張的阻力較大，從而決定向東，這就恰碰到了同類型而正向外擴張勢力的日本。兩隻餓虎狹路相碰，免不了要互咬一場。日俄戰爭就是這樣造出來的，結果竟打了一個敗仗。向外擴張不獨未曾達到目的，反而虧了老本，以致內在矛盾愈益激化。斯托利平的農業改革措施（一九〇七年），原想在農業方面獲得改進，以求國內市場對資本主義發展提供較有利的條件；但措施收效甚微，仍不能緩和內在激化的矛盾。

對內措施未收效果，又祇好向外想辦法；向東受了挫，祇好掉轉頭來向西南想主意。在英國的餌誘下，訂結了英俄同盟，共同對付德國，由此成爲第一次大戰協約國東戰場的擔當者。不料自己先天太弱，大戰進行還不到三年光景，由於統治力量迅速的消滅，不獨無法繼續對德作戰，而且無法鎮壓國內革命勢力。終於一九一

七年二月被勞動大眾的革命雄壯力量一舉而推翻，結束了沙皇的腐敗統治，把俄國推上了人類最光明的嶄新歷史階段。勞動階級的革命在俄國首先成功，正是她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半封建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特別脆弱易被打碎所使然。也就是她的產業革命對舊社會因素未澈底清除，資本主義未正常發展，致招首先天逝。

日本雖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動者，並且還發了一大筆戰爭財。但這不能緩和日本基於產業革命未正常發展而激化的內在矛盾，以及由這種特別尖銳的矛盾促使她向外的侵略行爲。「九一八」的事變，無疑是她內在矛盾的激化促使其向外侵略而釀成的。在中國的戰場上，他雖然佔領了中國廣大的土地，「以戰養戰」而進行了較長期的戰鬥，但結果終於倒下了。日本的敗倒，與其說是幾顆原子彈制伏了，毋寧說是她那資本主義體制先天虛弱；即使掠奪得大量資源，亦無法迅速消滅，不能不敗倒下來。而她的同盟者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倒後，被美、英等國再度扶植起來，恢復了她的舊有社會體制，造成納粹黨徒再度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也終於先行倒下了。

從上面的檢討，我們已可明白：由產業革命而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其走上帝國主義的階段，侵略屠殺的國際戰爭，是必然要伴隨而來。而產業革命對封建因素清除得愈不澈底，其發展也愈不正常的國家，又必然要成爲這種戰爭的首先發動者，同時又必然會先行倒下。

但上面我們還祇是就在二十世紀以前完成了產業革命的幾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及其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國際火併屠殺諸罪惡這一面而言，還沒有說到她們對各弱小民族或落後國家剝削蹂躪所造成的影響和後果。這方面，在此篇幅有限，雖然不便從詳說明，但有幾點却值得特別指出的。

第一，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國的剝削，是把落後國較低度的社會生產力作背景，因此凡足以限制被剝削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各種封建因素，剝削國必然要運用各種力量去維護其繼續存留，以求適應她的剝削進行和達成目的。其受剝削者，又必然無法改進生產力。

第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它對於控制下的落後國，必然要盡

可能使其殖民地化。或者扶植一個落後性質的政權，作爲其剝削的工具；這種落後性的政權，也祇有依靠帝國主義的扶持，才能獲得存在的機會。正因此故，它自然要替帝國主義盡忠服務，以殘酷手段壓榨本國人民，替帝國主義作輸血工作，這便是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個鮮明特徵。二十世紀以前沒有完成產業革命的國家，都無法逃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的厄運。

第三，正由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受着內外兩重枷鎖的束縛，它要完成產業革命，就必須首先打碎這兩重枷鎖。同時也祇有在這兩重枷鎖壓抑下的人民，才能起來以革命力量打碎它。受這兩重枷鎖壓抑的人民，很顯然是廣大的生產勞動羣衆以及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從而也祇有這些階層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格和革命行動。但民族工商業資本家，他們之所以不能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而變爲被壓迫者，正反映出他們革命的力量非常脆弱，不够負荷這種使命。這就決定了這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必然要以勞動大衆爲主幹。這不單是由於他們在人口構成上佔着最大的比重；而且還由於他們是兩重枷鎖壓抑下最直接最沉重的最大犧牲

者，從而也祇有他們才會發揮堅強龐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這事實便決定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產業革命不可能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產業革命的舊路。因為勞動生產大眾作了革命的主幹；革命勝利了，絕不會讓自己階層再淪入被壓迫被剝削地位，這道理是非常明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翻身過來的東南歐諸國，在其變革所建立的新社會體制形態，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把這些國家的革命稱爲新民主主義革命，把其改變過來的社會經濟形態稱爲新民主主義經濟，那末，就其社會體制變革過程中新的生產方法揚棄了舊的生產方法這突變的事實來看，我們也可以稱之爲「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

關於這種新型的產業革命，與封建社會經濟體制轉變爲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那種舊型的產業革命，在內容實質上有何差異，下一篇敘述中國產業革命時，還有說明的機會。因爲我們中國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要完成產業革命，也祇能走這條新途徑，創立這種新型的產業革命。

第三章 中國產業革命怎樣來完成

一 中國未能完成產業革命一般的看法怎樣

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還沒有完成產業革命這一歷史的使命。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

那末，中國何以到現在還不能完成產業革命？又如何才能完成呢？這問題曾有不少所謂「學者」「專家」先生們發表過很多的意見。有的認為中國自然環境適宜於農業，不適宜於工業；並以此立論而主張「中國應以農立國」。有的認為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重精神而不重物質，從而認為要完成產業革命，必須把中國人重精神而不重物質的觀念思想變更過來，才有可能。有的認為中國以前創辦工業，一開始就從軍需重工業着手，而不先發展輕工業，違背了產業革命的程序，於是主張完成中國產業革命，必須先發展輕工業，遵循產業革命的程序。有的認為中國缺少機

器和技術人材，不修資本；從而認定要完成產業革命，必須到外國去買大批機器，借巨額資本，造就和聘請大批技術人材，才有可能。有的比較略為科學的看法，是認為中國近百年來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商品傾銷所蹂躪，使中國工業無法發展起來；因此，認定要完成產業革命，必須實行李士特保護關稅政策。有的認為中國缺少富於企業心的實業經營人才，從而認為要完成產業革命，必須首先培植大批實業家。其他的意見主張還很多，這裏篇幅有限，恕我不便全盤介紹。但從已列舉的意見主張，已可反映出「學者」「專家」先生們對於這個問題認識的一般了。

上述這種看法和想法，在我們看來，是未免太缺少社會科學的修養根基，從而也就經不起事實的證驗。

說中國適宜於農業，從而當作不能工業化的原由，並由此而主張不需要產業革命達成工業化，就率性以農立國。這種看法和主張，如果不是有意做帝國主義的應聲蟲，那就是太無常識了。新大陸的美國農業的自然環境比中國還要優越，何以美國能順利完成產業革命，且成為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呢？從歷史上來看，產業革命已

完成的國家，在其產業革命未發生之前，無一不是以農業為主。中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國家，那與其說是不能發展工業完成產業革命之原因，毋寧說是未能完成產業革命，工業不發展的結果。老實說：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制下的世界，以農業爲主的國家，祇有充當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侵銷市場和供給原料那種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資格，根本談不到「立國」。日本帝國主義，過去高唱「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調子，那正是她企圖吞併中國的陰謀口號。所以這種看法和主張，不獨是謬誤的，而且是很危險的。

說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重精神而不重物質，從而認定它妨礙了中國產業革命的完成，這也是一種倒果爲因的庸俗說法。現在重物質的歐洲人，在產業革命以前的中世紀，他們在基督教統治下，腦子裏裝滿着「上帝」「天國」那種玄想幻想的意識；中世紀那種「忍慾苦行」的基督教徒，比中國固有文化思想的主流之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那種「安貧樂道」的說教，還要重精神得多。老實說，孔子周遊列國，與其說是爲傳布其「道」而講學游說，毋寧乾脆的說是爲了自己的「肚子」而到處

賣嘴巴；否則在陳絕糧也不會着急了。所謂「安貧安道」也者，不過是講講風涼話，與從前社會那些奢侈腐敗的寄生蟲統治者大倡「節欲」，同是一樣的假面具。從科學的視野來看，一種落後的傳統思想，固然也會妨礙社會物質的進步；但它的存在，却是把落後的社會物質基礎作根底的。如果那種落後的社會物質基礎沒有改變，生長在它上面的落後文化思想，也不易改變過來。反轉來說：要使落後的社會物質基礎改變過來了，生長在它上面的落後文化思想，也自然會或急或緩的跟着變更，它束也束縛不住。歐洲中世紀那樣重精神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到了十四五世紀歐洲封建經濟開始潰解時即隨之變革，便是很好的證明。如果說重精神輕物質的文化思想，有決定社會物質進步的支配作用的話，那歐洲近代的產業革命就不會發生了。所以這種說法是倒果爲因的。老實說，如果中國社會落後的經濟基礎不予以澈底改變，要想先把生長在這落後社會經濟基礎上的落後文化思想變更過來，是不易爲力的事。

說中國產業革命的受挫，是由於沒有遵循「產業革命的程序」所使然，也是機

械的呆板看法。產業革命的生產部門和技術改進，在英國固然體現着一種極自然的程序，但在其他繼起產業革命的國家，並未都遵循這種程序。但却完成了產業革命。前篇中我們講過了德國和日本，就是好的實例。她們不獨是輕重工業同時並進，而且還是先着重於重工業的發展。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全以重工業為發展對象，第二個五年計劃才大量發展輕工業；而其發展速度，更使先進國瞠乎其後。可見發展產業的程序，也並不是產業革命成敗的決定因素。就中國來說，張之洞、李鴻章等官僚，倡辦軍需重工業（他們也同時創辦不少輕工業），固然失敗了。而甲午戰爭之後以民營輕工業為主的各種努力，也沒有獲得成功。足見成敗關鍵並不在於是否遵循程序。英國產業革命表現出極自然的程序，那主要是由於她是首先發生產業革命的國家。她沒有利用別的國家進步的機器技術之機會，一切靠自己已應需要下來發明製造。後進的國家，由於有利用先進國的技术機會，並不一定要遵循英國那種程序才能完成產業革命。事實也早已證明了的。

說中國產業革命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機器、技術人材與資本，從而認定完成中

國產業革命，祇有向外國買機器，派留學生去學技術，聘外國工程師或顧問，多多的借外資，才有可能。這種看法，同樣是庸俗的，沒有看到中國產業革命受挫的主要基本原因。在第一篇中我們已說過了，產業革命中機器固然是擔任了重要角色，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革命，少不了機器；但是，社會條件如果沒有具備，機器不獨不易發明改進，即使從外國買進大批機器，也不能充分利用，俄國彼得大帝的歐化故事，就是很好的證明。滿清末年那批倡洋務的高級官僚，也買進不少機器，但結果都生了銹，變成廢鐵。技術人材，同樣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才能容許他的技術能力發揮出來。否則就是無用武之地。中國近幾年十年來聘請的洋顧問專家，統計起來，數目相當驚人，他們在外國固然是十足的「專家」；但到中國來，就變成不做事專領數千美金一月的高等「洋食客」。這也怪不得他們不做事，祇怪得我們這個社會沒有適當的事給他們做，使他們發揮專門技術能力。而中國自身出產的技術專門人材，無論是留學的或是在國內苦學而成的，為數亦不少，然而有幾個得到發揮技術特長的機會？許許多多有用的技術人材或專家，消極地埋沒了，固然是國家社

難以補償的重大損失，令人惋惜傷感；而許許多多有一門專長的人，偏偏要幹他不專長的事務：這些現象，與其說是「所學非所用」，毋寧說是「亂混亂搞」。其結果，自然免不了搞得一塌糊塗，這在人民心目中當然會痛恨。我們從學術立場來考察這些事象，自然也要歸根於落後的舊社會誤盡了他們。從這裏又可明白：一個國家有了促進產業革命的技術人材，如果缺乏社會條件，不獨技術人才會埋沒，甚至還會使那些具有一點某些技術專長能力的人，在舊勢力的戲台上，演出危害產業革命的悲劇來。就資本來說，它當然是產業革命不可少的物的條件。一個舊社會體制改變過來的國家，自己原始蓄積的資本不足，向外國去借，合理使用，自然也可以助長產業發展，完成產業革命；但自己社會舊體制未經變革，從外國借了錢來，不獨不會補充產業的資本，而且還會吞食原有的產業資本。這事實在最近我們這個國家更有力的證明了。近幾十年來中國政府所借的外資，統計起來已够驚人。這些外資，不是耗費在內戰屠殺人民上面，便是變成了壓榨人民摧毀民族工商業的官僚資本；真正用於促進人民生活，改進社會建設事業上的，恐怕還不到

千分之一。像這樣的外資，那怕再多借些，也無利於中國產業的發展，而祇有加大絞殺。因此，我們認爲丟開了社會條件來談利用外資，無異向外人借刀來宰殺中國人民。

至於說關稅權的喪失，或者缺少富於企業心的實業家，使中國產業革命不能完成。前一點還多少接近事實真理，後一點就庸俗得不成話。企業家或者說是產業資本家對於產業經營的興趣，不是先天生就了的，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裏培養起來的。在一個產業不能發展，常有破產停業威脅襲擊的社會，任何人都不會對產業經營感到興趣。事業順利，有發展，有前途，興趣才能發生，才能發動經營企業，才能把他造就成「富於企業心」的實業家。如果經營企業利潤無保障，甚至虧本破產，就是他有了實業家的地位，他也會立刻興趣銷沈，心灰意冷，很快的改行。假使洛克菲勒和福特之流生在中國的話，我敢斷言他們不會高興經營企業，更無法成爲「石油大王」「汽車大王」，充其量做個大地主或大官僚而已。所以，與其說有實業家才能完成產業革命，毋寧說能完成產業革命，才能培植實業家。

說到關稅權的喪失，妨害了中國產業革命的完成，這點我們並不否認。關稅權的喪失，確給與中國產業發展上以嚴重的打擊，但也並不是決定中國產業革命的主要基本原因。在產業革命早已完成的先進國，就有好些國家在其產業革命揭幕之前，就曾遭受外國商品殘酷的蹂躪。比如拿破崙失敗後之德國，她的幼弱工業，就曾遭受過英國商品潮水般流入的猛烈打擊。但未幾德國自身社會體制實現了若干改革，內在的抵抗力日益加強，終使外來侵蝕的力量，逐漸消失一些爲害的兇性。新大陸的美國在一七七六年前完全是英國的一塊殖民地，根本談不到關稅自主；獨立之後，自己才取得關稅自主權。日本同中國一樣，是在外國的鐵艦威脅下（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提督彼理“Perry”率艦隊至日本強迫開放港口通商），而開放國內市場，當時日本所處的地位，並不比雅片戰爭（一八四一年）時的中國爲好，但日本究竟完成了產業革命。

在我們看來，五口通商之後，如果中國能很快把舊社會關係予以改革，中國產業革命早已完成了，那裏還會淪入半殖民地的泥坑！我們應明白：一個國家沒有自

主的關稅權，正標幟着這國家還沒有獲得獨立的資格，失去了獨立地位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完成產業革命。

我們要瞭解中國產業革命遲遲未能完成的原因，必須從中國社會本身結構以及它受到怎樣的外來因素影響這兩方面去考察，才能明白其根由何在。因為任何一個國家要完成產業革命，必須它自身具有一定的社會條件才能達成。這些社會條件是什麼？在前面第一篇中我們已具體的指陳了，中國產業革命所需要的社會條件，不是由於中國社會本身結構若干特質妨害了它的產生和成長；而且還由於外來勢力的壓抑絞殺，阻抑了它的生長，這是下一節我們要進而分析說明的。

二 中國產業革命未能完成的原因何在

中國產業革命遲遲未能完成之原因，就我們的研究，是由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體制沒有澈底潰解，以及帝國主義殘酷剝削壓抑這兩重枷鎖的束縛所使然。這兩重枷鎖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維繫的；而其危害於中國社會經濟，又是相互幫兇的。

但就其形成而言，後一重枷鎖是把前一重枷鎖作基礎而套上起來的。也就是說：帝國主義殘酷地剝削，壓抑了中國產業的發展，是把中國傳統的沒有澈底潰解的封建社會體制作基礎而發揮其危害的兇性。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體制，又是依賴着帝國主義侵入勢力的支持而獲得了繼續殘存的機會。因此，我們要明白中國產業革命未能完成之原由，祇得考察這兩重枷鎖是如何形成起來的，又是如何幫兇起着危害摧殘的作用的。

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體制，是由傳統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為基礎與相應而建築於其上的封建官僚政治體系，作為其構成的具體形態和內容實質。所以我們要理解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殘餘體制這重枷鎖是如何的妨害了中國產業革命的完成，就得首先分析它所由構成的這兩個部分。

傳統的土地佔有關係和中央集權的封建官僚政治體系，是中國封建社會體制對西歐封建社會體制所表現的不同特徵。在西歐封建社會體制裏作為剝削人民主要工具的土地，是不能自由買賣的，因此，由這種土地的生產手段所結成的封建生產關

係，也具有較大的定着性；從而這種封建社會體制內在生產力的發展較易把它的外壳（即封建的生產關係）突破，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社會體制（即資本主義體制）也較易誕生出來。亦即產業革命所需要的社會條件較易形成，從而產業革命也較易發生和發展。

因為在西歐，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其主要剝削工具的土地這一生產手段，是封賜的，是與被封賜而得來的土地所有者人格身份合而為一，土地不單是他的財富多少的標誌，而且是他封建爵位高低的烙印。正因為土地是封賜得來的，與人格身份合而為一，所以土地才不能當作商品自由買賣。各大小土地封賜領有的領主，便是在上級領主分封賜地的安排下而結成一種疊羅漢樣式的封建領主隸屬系列的；各大領主祇有縱的隸屬關係，而無橫的互通聯繫。

各領主領有一定的土地，並佔有一定的農奴。農奴是領主土地上的直接生產勞動者，不能自由離開領主的土地，而成為領主土地上的附屬品。這樣形成了封土而治依土而食的地方分權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體制。直接生產勞動的農奴，與領主人

格身份雖是不平等的，但由於他們全家人是領主土地上的附屬品，是領主寄生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的直接提供者；爲保證這種生活物質條件能够經常由剝削取得而不致枯竭，非萬不得已的場合，領主對農奴的剝削，不能不適可而止，且加以保護。至少要讓農奴能够生存和繼續其再生產，領主的寄生所需物質條件才有來源。這正如同靠畜羊羣剪羊毛來維持生活的人一樣，要羊毛好好生長，有豐富的剪割，不能不顧及羊的生存和成長。

加之在各自給自足的領地區域內，可能由交換取得的享受物質條件，從而擴大消耗，不獨受交換關係和自然條件所拘限，而且還受領主的胃囊所限制；所以領主對農奴的剝削，其殘酷程度，也還有個最低而不使超越的限度。同時，在這種領主封建社會，農奴不單是封建寄生階級生活物質條件的直接提供者，而且還隨時可以成爲領主的武裝護衛者；從而封建統治者可以不需要蓄養大批的常備軍（在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是一種小的領主，他們自己有主人封賜的土地和農奴，不需要主人，即他們的上級領主另外給養）。所以農奴的負擔主要的祇是貢納，祇是領主一方面的

剝削。加之，農奴所耕作的土地是固定的，沒有隨時被領主撤銷其耕作權而失去其生產手段使用的威脅。這樣，農奴有能力改良土地生產，他也願意去改良。因而生產力提高的可能性也較大，生活物質條件陷入絕境的場合也較少，生存問題總還有主人方面的最低保證。我們還沒有發現歐洲中世紀的人民有吃樹皮、吃觀音土、吃野草、吃死蛇、死老鼠的事實。

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商業高利貸資本隨新興市民階級抬頭而活躍的時候，它表現了潰解舊封建社會很強烈的革命性格，從而這種商業高利貸資本所有者的新興市民階層，發揮了很英勇的反封建爭自由的民主革命戰鬥精神。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把自己轉為封建領主貴族，靠蓄養農奴來過着封建的寄生蟲生活，祇有把封建舊生產方法弄毀，並由此而獲得活勞動力的工資勞動者，自己來從事商品生產經營，組成新的生產方法，才有發展的前途。因此，由原始蓄積累積起來的商業高利貸等資本，也易轉變為產業資本，發展產業革命。

但在中國初期領主封建體制自秦代潰解而轉為地主封建體制後，其結構與作

用，和上述中世紀歐洲的領主封建體制，却有着不少的差殊。秦代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置郡縣」，那固然是順應秦以前的領主封建體制無法繼續維繫而採取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却使地主封建體制得以正式確立。自此以後，作爲封建剝削主要工具的土地這生產手段，便可以自由買賣。土地既成爲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有錢人都可自由買進土地變爲地主，而不靠封賜才能成爲封建的剝削階層。這樣，主要剝削工具的土地，便與人格身份分離，耕作土地的直接生產勞動者，已不再是土地上附屬品的農奴，而變爲人格身份自由的農民。

但也正由於農民不是地主土地上固定的附屬品，地主的土地就不患沒有人耕作，地主沒有像領主那樣須得顧及農奴的生存，有保障農奴能維持全家人最低生活水準的義務，地主對他的佃農可以更殘酷的剝削，用不着顧及佃農的死活。所以在地主封建制生產方法下的佃農，比領主封建制生產方法下的農奴，更悲慘，更痛苦。

加之土地不是封的，封建統治集團各人員不能成爲「封地而治」的領主，而成

爲「給俸而食」的官僚，各地方徵收自人民的國賦國稅須輸繳中央，再由中央以俸祿或薪俸形式轉發給各級官僚。中央掌握着全國財政經濟權利，各級地方官僚都得聽命中央法令而行動，區域割據的領主分權政治不易形成（除非中央失去了支配權的王朝末年的場合）。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系就是在這種地主封建經濟基礎上形成起來的。每一個官僚所在的官位不是長久固定的，「五日京兆」是很平常的事情。這樣，任何官僚抓得一個官位，都會利用其在位的時機和權力大量搜括。也正由於可以大量搜括，「發做官財」，所以大家都對做官特別有興趣，特別喜歡捧官，用錢買官做。官也容易得到，並且也容易做。以前科舉考試制度下，能寫幾篇文章頌德的文章和詩詞，固然可以由科舉出身而做官。就是沒有那種寫作的實在本領，只要有錢，也可以買個捐班，官運就可亨通，就可以大發官財。到了民國以來，更容易了，有錢進大學弄張文憑，或者跑到外國去留一回學，弄個洋博士碩士，就可成爲「權威」，做高級官僚。就是不進大學不出洋，有錢也可以買張假證書，或者進官辦的訓練班，受幾個月訓，也可以取得做官的身份，甚至還不要這一

套條件，父親做了官，伯伯叔叔、舅爺外甥、子女郎婿、乾兒子，都可一起擁進衙門官廳，做主任、當副官、任科長科員。這種近親的血緣裙帶關係，撈錢也最方便。撈錢之外，只要辦理一下「等因奉此」，不必做爲人民服務的事，所以任何寄生者都有做官的「本領」。在這樣的官僚集團裏，不獨不需要做事的能力，而且也不需要多做事的行爲，以免辦移交時落得麻煩。中國歷朝官僚集團的統治者，貪污腐敗無能，正是中國這種傳統封建體制的必然產物。

從某一面來看，地主封建制好像比領主封建制爲進步，勞動力不受封建隸屬關係所束縛，全國在一個中央政府的統轄下，商業資本比在領主封建制度下也易發展累積。事實上自秦漢以後，商業資本確是很活躍，高利貸資本也很猖獗，因爲在全國統一的政權下，不獨貨幣與關稅的劃一，有利於商業資本的擴展活動，而且全國賦稅軍需物資運上運下，交通四達，亦有助於商業資本的週轉累積。加之在地主和官僚層剝削敲榨壓抑下的人民，自給自足很難辦到，他們不獨要依賴高利貸，一般是在收穫後由於各種負擔壓抑下先賣掉自己的生產物，過後在生活壓迫下

又得從市場上買進生活品。這正是商業資本獨立活動與高利貸資本趁火打劫的有利場面。

但這種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擴大累積之後，何以不易轉為產業資本促進產業革命呢？這原因祇有從中國傳統的土地佔有關係上去考察才能明白。中國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比歐洲封建莊園制度潰解過程中那個時期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形頗有不同：後者是原始蓄積起來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它們把封建莊園體制弄潰解了，同時也造出了自己轉為產業資本的有利情勢。因為莊園封建體制的潰解，農奴經常暴動和紛紛離開農村，已不易藉土地為剝削工具了，要將商業高利貸資本去購買土地或轉為土地資本，藉地租來累積，更屬不利；因為地租在上述情況下，已高不起來了，故轉為土地資本不及轉為產業資本較為有利。從而這種累積起來的商業高利貸資本，也易轉為產業資本，促進產業革命。在中國地主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那不是封建體制已趨潰解，土地已成爲不利的剝削工具；相反的正是地主封建體制存在的常態，地租很高，把商業高利貸資本轉為土地資

本，同樣有利於累積。從而當商業高利貸資本活動受到政治勢力阻撓干涉或壓抑的場合，它們就相續轉爲土地資本，商人高利貸者亦由此而變爲地主，變爲封建統治階層集團裏的成員。反轉來說，地主的土地既不是被封賜得來的，而是用錢買來的，沒有一定封賜人格身份的拘束，他從地租上累積得的資本，不獨可以繼續用於購買土地，而且可以用於經營商業和高利貸。因此，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就變成三位一體，累積起來的商業高利貸資本，既可轉爲土地資本且極有利，它們自然沒有必須轉爲產業資本的必要。商業高利貸資本所有者，既可兼做封建的地主，也沒有反抗封建地主統治的必要，因爲彼此利益是共通而不相排斥的。中國市民階層其所以缺乏反對封建的強烈革命性格，不易成爲產業資本家階層來推動產業革命，原由卽在此。

在中國這種地主封建制度裏，不獨商業高利貸資本易轉爲土地資本，使它不易轉爲產業資本而妨害了產業革命的生長；而且它在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系下，造出王朝不斷覆亡與不斷再生的史劇。因爲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是靠榨取全國農

民生產勞動所提供的剩餘生產物作爲其存在的基礎。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活躍累積，是以侵蝕破壞農業小生產的生產條件來達成的；所以商業資本的活躍，不單要造成高利貸同時猖獗，而且必然要由此招致王朝重農抑商政策的干涉。自秦漢以來各王朝每當商業資本很活躍的時候，抑商政策便被採用。商業活動受到壓抑，不獨土地資本不向商業資本轉化，而且驅使商業資本進入農村，轉化爲土地資本。由此而引起地價騰漲，地租上昇。地租愈高，土地資本累積也愈速，購買土地也愈有利，有錢人便愈要搶購土地。由是而促成土地迅速集中，地租愈益高漲，農民生活愈陷困境，高利貸也伴着猖獗了。

在農村土地迅速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另一面便是大多數人失去了土地。在農村的人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權的人愈多，他要生存就不得不依賴別人的土地去從事耕作；從而爭地佃耕的人也愈多。這樣便促成地租猛漲，農民生活愈加困窘，高利貸也愈加猖獗，農民也更難生存。於是離村逃荒，老幼死於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匪盜」蠡起，天下由此而大亂。亂既發生，爲保存王朝統治權利，自然要動員

「戡亂」。抽壯丁、繳糧餉，就得雷厲風行。這樣，殘留在農村的人民便愈陷入絕境，死亡、逃難，挺而走險，愈戡愈亂了。一二綠林豪傑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大局演至這步田地，是無法收拾了，王朝的「神器」隨之倒台。平日依賴這「神器」招牌，靠老百姓供奉而過着寄生腐敗無恥生活的大小官僚羣，祇有慌忙淒慘的逃匿，各尋生路。王朝的醜劇宣告閉幕，商業高利貸和土地等資本，亦隨王朝的覆亡而陪葬。

在王朝覆亡天下大亂的過程中，武裝反抗舊統治的廣大農民，由於缺乏革命的正確認識和領導，其結果不是失敗，便是被豪劣地主官僚集團裏的流氓地痞頭子所利用；而互相殘殺到最後，剩下來一二流氓地痞頭目，把人民流血鬥爭所換來的勝利果實，當作自己個人的英雄業績。於是自稱帝王，在舊王朝的廢墟上豎起新王朝的「神器」招牌，把殘餘的農民送回荒廢破爛的農村，把跟隨的人馬安排一番，依照舊王朝的模型，重樹起一套官僚統治剝削機構。殘留隱匿的地主豪紳官僚吮血鬼，不獨未加以清算，反而在「招賢納士」的漂亮名義下，把這些封建渣滓重新收

羅進來，歌功頌德，皇恩無疆，封官賜爵，忙得不休的擺場面，爭官位。對於舊社會制度，不獨不加以改革，反而力謀復原；量變而質不變的傳統封建體制，就是在這種改朝換帝的「蛇脫壳」式之下變形過來。

新王朝開台之後，要國賦國稅有豐裕的收入，就不能不休養生息；於是省刑罰，薄稅斂，獎農重農安農等政策，都得採施。從而在建國之初的一二君主治理之下，一般人民所受到的壓榨總是比較輕微些；「亂久必治」的平安局面由此呈現，社會生產亦藉此而恢復。但以後由於地租賦稅的收入增加，寄生階層消費亦隨之擴大，商業資本的活躍累積又獲得了機會，前朝的重農抑商政策，便被再版。遭抑則轉，由是而引起土地集中，地租高漲，高利貸猖獗，廣大農民無法生存於農村；逃亡走險，暴動反抗，王朝統治大受震撼；於是動員戡亂，抽丁徵糧，愈戡愈亂。在這種激劇演變下，封建統治官僚集團所唱演的醜劇，終必至於全部垮台。走入與前一個王朝相似的覆亡厄運。大亂之後，剩餘下來的另一批人馬，收拾殘局，又在舊社會基礎上重新樹起新的王朝舞台，這個新王朝又必然要走着前一個王朝的舊步

法。秦漢以來的中國封建社會，就是這樣表現出改朝換帝量變而質不變的發展旋律，也就是這樣的把中國長期的停滯在封建階段。

但這也並不是說中國封建社會體制就患了不孕症，絕對不能孕育出產業革命的條件，祇是這些條件尚未達到全部成熟時很易在母胎裏被絞殺。到了近百年來，更被外來的帝國主義魔手伸進來幫兇絞殺。鴉片戰爭前夜，滿清王朝已發展到盛極轉衰的下坡；鴉片戰爭的失敗，滿清的統治體系即開始潰解。這事實表現在廣大農民羣衆武裝起來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上，是極鮮明的。這革命比以前各王朝末年的農民革命進步多了；有較進步的社會改革政策綱領，組織亦較健全，故能迅速席卷大江南北，使滿清王朝幾瀕於覆滅。這革命如果勝利了，改革政策實行了，是可能把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體制變更過來的。不幸的是：國際資本主義眼看到中國社會體制行將轉變，對於他們不利，於是派兵援助滿清，致使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遭遇挫折。加之領導人物初得勝利之後，生活即流於腐化，內部團結亦趨分裂，終致革命失敗。這一來，不獨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未獲改革，而原始蓄積已產生的條件，亦

在長期的戰爭中損耗殆盡。以致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之後，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在舊社會基礎上創辦的工業，其結果都變爲虎頭蛇尾；不獨效果未收，反而把中國可能在這時期完成產業革命（假定太平天國革命成功的話）的時機耽誤了過去。以致到了甲午之役，便注定了中國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身份。因爲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由自由資本主義走上了獨占資本的帝國主義階段。在帝國主義國際聯繫的鎖鍊下，任何一個落後國家要完成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誕生成長的產業革命，是不可能實現了。

這道理後面我們還有說明的機會；這裏我們要指出的，是甲午之役失敗後，各帝國主義都明瞭了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是腐敗已透，毫無一點對外抵抗力的國家，這正是各帝國主義瓜分蠶食的最好對象。大家都要分割一塊，誰也不容誰獨佔中國；所以戰勝國的日本無法獨吞中國，結果大家根據美國所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來共同分食中國這塊肥肉。於是從馬關條約開例，各帝國主義紛紛提出租地借港、關稅優惠、開礦、建廠、築鐵路、內河航行……各種各色的不平等

要求，腐敗的滿清王朝都一一接受了。於是關稅貿易權、工礦開建權、貨幣金融權、交通運輸權、領土自主權，……都相續落入國際帝國主義的魔爪中。中國也就是這樣淪入半殖民地的火坑，在傳統封建的枷鎖上，又加上一條國際帝國主義的沉重鎖鍊。

隨着就爆發了辛亥革命，滿清王朝雖然被推翻了，但中山先生所揭示的三民主義，不獨未能實現，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反而在這種封建買辦獨裁恐怖統治下被蹂躪得死去活來，那裏還能發展產業！

然而人民的力量，在愈腐敗的統治下，却會愈生長；在愈兇惡的屠殺壓抑下，却會愈抬頭、愈膨脹。當前排山倒海的人民革命力量，已够證明這種真理。也祇有這種革命力量，才能把中國傳統封建殘餘勢力和支持這種封建勢力繼續殘存的帝國主義束縛壓抑這兩重枷鎖，澈底摧毀；亦惟有澈底摧毀這兩重枷鎖，中國產業革命才能加速完成，這是我們必須認清和把握的。

三 如何完成中國產業革命

依照歷史發展一般法則來說，人類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階段，是不能跳越的。因此，讀者也許會這樣認定：中國產業革命也祇能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產業革命所經歷過來的舊途徑，亦即由封建社會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體制。這樣的來完成產業革命，才符合歷史發展的法則。

不錯，人類歷史的發展是有着自我的發展軌迹，其經歷諸特定階段，是不能跳越的。中國當然也不能由封建社會一跳就跳到社會主義社會，但同時我們也得認清：歷史法則祇是顯示人類社會發展上的一種必然性的趨向，這種趨向體現在各特定社會能貫徹到如何程度，還要看各特定社會的具體條件。中國已早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兩重身份；如果在七八十年以前中國完成了產業革命，那中國自然是走上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其產業革命也自然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走一樣的途徑。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沒有在當時完成那種歷史變革使命，而淪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身份。這身份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產業革命的舊途徑。這道理，我們從以次幾方面加以考察，就可明白。

首先，從革命的階層和資本家生產所需要的工資勞動者來看，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革命，是以新興資產階級為主幹進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們從革命勝利中建立起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要求的政權，並利用此種政權作護育條件，把從商業高利貸累積起來的資本轉為產業資本，由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擴展來完成產業革命。正因為這種反封建的革命，目的在發展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他們對於封建土地佔有關係之改革，就不會遷就農民利益的要求，使農民獲得土地。相反，他們是爲了自己階層實現豐厚利潤，擴大商品生產，需要大量工資勞動者，使農民失去土地，變爲產業預備軍，變爲資本家利潤源泉的提供者。但當前中國的革命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要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首先就得打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重壓抑的枷鎖。這革命的重大使命，中國民族工商業資產階級是負荷不起來的，必然要落在勞動大眾的肩上，這原由前面我們已

說明了。當前革命陣營中的戰鬥成員，勞動生產大衆是佔了最大的比重，更是鐵的事實證明。也正因此故，這革命勝利之後，要排除勞動生產大衆的利益，把他們再置於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殘酷剝削下，那是不可能辦到的事。這就決定了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擴展所需要活勞動力之人的條件是不能解決的，從而由資本家商品生產的擴展來完成產業革命，也是無法實現的。

其次，我們就資本家生產方法所需要物的條件的資本來看：在先進各資本主義國家產業革命，新興市民階級在原始蓄積中，不獨提製了商品生產所需要的自由工資勞動者，作為資本家生產方法靠利潤而擴大的前提條件；而且還由商業高利貸首先累積了大量的資本，可直接轉為產業資本去使用。但中國當前情況就大不相同了：聽任剝削的自由工資勞動者在上述的原因下固然不易解決，從而阻礙了資本家生產方法的發展；而需要原始蓄積物的條件的資本，更無法充分獲得。因為中國由原始蓄積已累積起來的資本，除帝國主義宰割去的以外剩餘下來的，大部已轉化為官僚資本。這種官僚資本是剝削全國人民大衆最兇殘的東西，它由殘酷剝削全國人

民而累積起來的。在全國人民解放革命勝利後，自然會把它沒收充公，當作全國人民建設新社會的公積金，而絕不會讓少數私人或資本家當作私的「勝利財」去佔有。這種官僚資本不單是包括官僚集團以「國家」名義而佔有的「國家銀行」與「國營企業」（省市縣級政府所佔有的銀行和企業亦包括在內）的全部資產，而且還有許多以私營的名義或參與私營機構而存在着。它一旦被人民收回當作公有，任何資本家也就不可能利用它來作為私人剝削的工具。這也就決定了由資本家商品生產的擴大來完成中國產業革命，是不可能的了。

再其次，我們就市場條件來看。資本家商品生產發展，是受市場條件所規限，在二十世紀前完成產業革命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國際市場還沒有被獨占資本所統制；資本家商品生產內在矛盾所造成商品在國內市場過剩時，還可向國外傾銷，實現利潤，藉以繼續擴大商品再生產行程。但是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國際各落後地區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市場資源，不獨已為各帝國主義獨占資本分別的控制壟斷，而且已激起那些控制壟斷下的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巨浪。在這種場合下，莫說

那些區域市場在帝國主義獨占控制下或者人民革命勢力抗拒下，使我們這個國家裏資本家生產出來的過剩商品沒有輸去傾銷的機會，不可能從那些地域市場攫取廉價的原料和勞力；即使帝國主義讓我們的商品輸出自由競銷，他們高度生產力所生產的巨量價廉物美商品擁擠在那些市場上，我們生產技術條件均較落後所生產的價昂物劣商品，也不是自由競爭的敵手。那麼我們要以商品生產制度來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國外市場也沒有容許的條件。效德日法西斯主義的手段擴展軍需品生產，實行軍國主義，用武力去掠奪嗎？德日等國走這條路已被打得頭破血流，悲慘的下場，我們踏着他們已走不通的舊路，難道還能走通麼？這以常識來判斷，也會知道是絕不可能的。

從上面的檢討分析，我們已可明白：從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來完成中國產業革命，國內外的條件已不容許。但這並不是說民族工商業資本應遏止其合理發展，誰也沒有理由否定民族工商業資本在新中國經濟建設上還負有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協助使命。這使命它是能够負荷的。因為民族工商業資本在現階段中國社會裏，還是被

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所壓抑，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社會生產力停滯的生產過剩爆發為經濟恐慌的境地；所以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束縛撤除之後，民族工商業資本，還有合理發展的機會。所謂合理發展，是指在勞資兩利的原則下來提高生產力，擴大生產規模。因為民族工業本身資本的有機構成還很低，它可以藉改進生產工具由提高生產力來保證它應得的利潤，而不需要藉壓低工資來保證它應得的利潤。它可能由此方式獲得發展：就是由於中國社會生產力還很低，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還不能發生；以後走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路，經濟恐慌更不會發生，所以它還有合理發展的機會。現在有些經濟學家很機械地推論，以為民族工商業在未來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發展中，很快就會被國有工商企業所吞併或走入沒落窮途。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是忽略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進程中，國有企業居於領導地位而推行的部分計劃經濟，必然會提高人民購買力，從而有利於民族工商業合理發展這一光明面。雖然民族工商業受國有企業所領導，不可能由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社會；但它在國有企業領導下而逐漸變為計劃經濟全體

系中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並不能就看作是民族工商業被吞併而滅亡；這是經濟理論上一個較深刻的問題，我們在此沒有多餘的篇幅來詳細說明這些道理。這裏我們祇是提示出：民族工商業在新中國經濟建設上，客觀條件使它還有良好的合理發展機會，用不着對中國社會即將降臨的新形勢發生畏懼；認清了自己光明前途，更應積極的來參與新經濟的建樹，與國有企業共同配合來加速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求早日完成中國產業革命這新的歷史使命。

上面我們還祇是指出中國社會當前所具有的具體條件，已規限了它不可能由資本主義或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擴展來完成產業革命，還沒有指出中國完成產業革命應走也祇能走的新途徑，其內容、形態、性質究竟是怎樣的。但就上面分析檢討，我們已不難把這種新途徑加以較具體的指陳，因為這種新途徑也是被前面所指陳的具體條件規定了的，並不要我們憑空玄思幻想的去塑擬。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革命的性質，規定了它經濟建設的途徑；由於它生產的落後，它在新經濟建設上的迫切要求，便是如何迅速地來提高社會生產力。產

業革命即是以這種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來達成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首先以革命力量打碎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束縛兩重枷鎖。而這種革命力量又是以生產勞動大眾為主幹，這又決定了革命勝利的新政權，必然要以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為特性。由是也就規定了新經濟建設諸般具體措施必然要以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為目標。社會生活的改善是把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作前提，因此，提高社會生產力與改善勞動人民生活，便成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上的最高指導原則。一切改革措施，必須符合這個最高原則。也祇有實現這原則，中國產業革命才能完美的達成。中國產業革命新途徑新內容和新形式，根據這個原則和具體條件，也就不難指陳了。

沒收全部官僚資本，在理論上，在事實上，是沒有問題了。這次革命的勝利，是必然要把全部官僚資本當作全國人民建設新經濟的公積金，或者當作完成產業革命補充原始蓄積物的條件。這事實的實現，它規定了新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主導經濟部門的內容形式和性質。因為官僚資本已發展到了獨占形態，它控制了全國銀行金融、交通運輸、工礦企業，以及進出口貿易諸部門經濟活動。一旦把全部官僚資

本收歸公有，改變它的屬性，它不獨不會再對國民經濟起危害作用；而且必然會成爲改善國民經濟生活的有力推進器，成爲走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領導部門。因爲它是由真正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所經營管理，這種新政府，勞動大衆居於中堅地位，這就保證了這種國有諸企業機構不會像封建買辦性的官僚集團所掌握那樣專用來壓榨人民。因爲掌握它的政權是以勞動生產大衆爲中堅，勞動生產大衆掌握了它，它就不可能成爲剝削工具，這道理是非常明顯的。但它也還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因爲這些國有諸企業在全社會經濟有機結構中，還有私人資本聯繫和參與活動；而它所隸屬的政權也不是純粹勞動階級的政權，還有其他民主人士參與其中。所以這種國有諸企業，既非資本主義經濟的性質，也不全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正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性質的特徵。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便是由這種國有企業的發展作推動軸心和內容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正由於這種國有企業在新型產業革命中居於主要構成部分，它推動的產業革命就可能實施若干計劃經濟，而不是資本家商品生產發展所推動的那種產業革命。這正是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的顯著特徵。

但上面還祇說明到沒收封建買辦性官僚集團直接從人民身上榨取去而累積成的官僚資本，作為補充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原始蓄積的資本。但僅有這方面的條件，還是不能實現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還必須把傳統的土地佔有關係加以澈底合理的改革，才能使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順利完成。這方面的措施尤為重要，因為傳統的土地佔有關係不加以改革，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根本就無法脫胎換骨的變更過來；僅把舊勢力的上層建築加以改換而不挖根，那舊勢力在舊社會基礎上仍會再生長起來的。而改革措施得不合理，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亦難順利達成。這是萬不容忽視的。

關於傳統的土地佔有關係應加以改革，在參與革命的各社會階層，都已共同認定而沒有反對的。我們在這裏所要探究的是怎樣改革才合理，才能配合新民主主義產業革命順利的完成。因為在這方面，主張改革的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和主張，所以值得我們討論一番。

土地問題是包括城市土地問題與農村土地問題兩方面。近年來大家集中討論的

是偏重在農村土地佔有關係的改革方面，而對於都市土地問題的解決討論得較少，這顯然是由於中國還是落後的農業國家，農村土地佔有關係不合理表現得很突出，所以大家集注於這方面研討。解決農村土地問題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主張：一種是主張把全國土地立即收歸國有，取消土地私有權，實行土地國有政策。另一種是主張實踐中山先生所提示「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在我們認為後一主張是較為合理而適合於現階段中國實際情況的需要。前一主張表面看來是非常進步，實際上却並不適宜。因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並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立即實行土地國有，在理論上說不過去，在現實上也還不需要。農民的意識是相當保守的，私有觀念還很強固，他們積極的參與當前革命行動，是要求獲得土地，並不是要求實行土地公有。在這場合，如果立即實行土地國有，不獨不易刺激農民積極生產勞動，提高農業生產力，反而還會更鬆懈生產勞動，降低生產力。因為在農民的保守意識中，國有是公家所有，與他的私有是大大不相同。公家所有的東西，他能否長久保留使用權，他是會懷疑的。使用權不能確保，他就不願積極的去改良土地，從而土地生產收穫也

就不會好。蘇聯在十月革命宣布土地國有的初幾年，曾引起農業生產衰落，後來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還讓了步。何況蘇聯十月革命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當前中國的革命，在性質上還沒有蘇聯十月革命那樣的高級，所以立即實行土地國有是不適合實現情勢的需要。「欲速則不達」，這是經驗話，也是值得重視的。因此，我們認為實行「耕者有其田」較適合於中國現階段廣大農民的革命要求。

但「耕者有其田」如何達成呢？用怎樣的辦法來達成「耕者有其田」？這又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所謂「買去地主」，即由政府或農民自己出錢把地主富農的多餘土地買來，使土地佔有平均化，以達成「耕者有其田」。另一種是主張把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無償付的沒收，再分給缺少土地或沒有土地的貧苦農民，由此而達成「耕者有其田」。這辦法中共土地法大綱已明確規定，並已在解放區實行。在我們從科學理解的立場來看，前一種主張，與其說是革命的土地政策，毋寧說是反革命的土地政策。由政府出錢把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買來再分給農民，這在地主富農固然是歡迎，但政府收買土地的錢由何而來？據專家估計，中國政府要收買地主

富農多餘的全部土地，以戰前地價來估計，就要千多億銀圓，任何政府也沒有這樣龐大的財力辦到這點。所以這種辦法是做不到，也少人主張採用了。另一種「買去地主」的辦法，便是要農民自己出錢向地主富農買他們多餘的土地，政府祇站在引領人或中介人的地位。國民黨政府所唱的「扶植自耕農政策」，發行「土地債券」，就是企圖實行這種辦法來達成「耕者有其田」。這是很反動的政策。莫說是推行不開，就是推行實現了，不獨不能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業生產力，促進工業化；而且必然要使農民生活更困苦，更無法改進農業生產，產業革命或工業化更受到阻礙，這是需要進而加以批判分析和指出的。

用土地債券一類的辦法來扶植自耕農，農民不僅要借債來買土地，而且有許多赤貧農民還要借債來買耕作土地的農具種子諸生產條件。這樣扶植起來的自耕農，是無力改良生產的。他的經濟地位祇是由佃農貧農變為債農而已。在長期的重重債務壓抑下，就愈要陷入高利貸的殘酷蹂躪之境。他無法改良生產，也就無法改進生活。這完全是替地主富農謀利益的辦法。其結果，就是扶植起來的小生產自耕農，

也會陷入像俄國農奴解放後束縛在「密爾」上的農民同樣悲慘的命運。所支付的地價與俄國農奴解放後所支付的長期付價「贖買身份金」毫無區別。這樣，農民生活無法改善，生產無法改進，不獨工業發展上所需要的原料和產品的銷路市場條件無法獲得，而且還要受活勞動力供給缺乏的限制。因為用機械生產的任何工業品，無論是當作「爲利潤的」商品生產，或是當作非爲利潤的生產，其生產品不能是自給自足，必然要在交換方式上供給別人消費，並由此而取得原料和勞動力，用作再生產的條件。農業部門的生產無法改進，農民沒有多餘的生產物用以換取工業生產品，工業部門就無法獲得充足的原料。同時扶植起來的小生產自耕農，由於他費盡心血買進一塊土地，他就不會輕易的放棄那塊土地的生產。這樣農村的勞動力就會被土地強韌的束縛而不易轉移於工業部門。因為要合理的轉移農業上的活勞動力於工業部門，必需農業生產勞動能節省出多餘勞動力；要農業生產部門能節省出大量多餘活勞動力，祇有改進生產工具，採用機器農具。但機器不是在豆腐塊佔有的耕作土地生產上所能使用，必須是大農場。這種大經營的農場，用上述的辦法扶植起

來的小自耕農，固然是不會產生農業資本家來經營的大農場，同時也不易形成合作的大農場，國有化的集體農場更難實現。因為扶植起來的貧窮小自耕農，誰也沒有大量的資本把自己變為農業資本家，購買機器租借土地去經營大農場。用合作方式來達成麼？在上述辦法扶植起來的自耕農，也很不易實現合作，因為合作必需合作者所支出的勞力與報酬能够平等才易合作起來。這在上述辦法扶植起來的自耕農，彼此合作，就有許多妨礙合作平等的因素存在着。因為各自耕農戶人口勞力是不齊一的，彼此所有的土地，面積大小、肥沃程度都不同，從而買入土地時所支付的地價也不同。這在實行合作時生產物分割標準，就很不易公平。因為要公平分割合作生產物，祇能以各合作戶所出的勞動大小作標準，這就不能顧及各戶參加合作的土地肥沃程度的標準。這樣，土地肥沃的農戶就不願意參加合作了；因為他買進那塊土地是費了較多的本錢，他不能多分得生產物，他會感到參加合作是不合算，從而不願去參加。那末，把土地成本也作為分割生產物的標準嗎？這在出勞力多土地成本少的農戶又不願參加；因為土地成本多勞力少的農戶等於在合作中投資，把自己

變爲隱蔽身份坐收地租的地主，從而也不易與人合作得起來。

合作農場既不易實現，國有化的集體農場更難辦到；因爲現在由支付地價而扶植起來的自耕農，政府日後倘要把他們的土地收歸國有來經營集體農場，由政府補償地價來收歸國有嗎？收購土地的巨額資金仍難籌措。不償付地價嗎？那就要對今日扶植起來的自耕農再來一次流血革命。它們的反抗力，比今日的地主的反抗力就要大多了，其造成的後果，是不難想象的。

因此，我們認爲以有償方式使用土地債券一類的辦法來扶植自由耕農，不獨不能促進產業發展，而且無法改善農民生活，祇是替地主富農謀利益而已。這在理論上說不過去，在現實情勢亦不能容許。因爲當前的革命，農民在其中發揮了龐大的力量；他們不能得到革命勝利的果實，革命武裝行動就會長期的繼續下去。所以我們認爲祇有以無償的方式把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沒收起來平均分配給農民，才是對現存土地佔有關係澈底改革，澈底拔除封建殘餘勢力的根基。也祇有這樣，才能滿足農民革命要求，順利達成農業合作經營與集體農場，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加速新

民主主義產業革命早日完成。

說明到此，讀者也許會這樣想：中國地主富農的土地，不是封賜得來的，而是花了錢買來的。沒收民族工商業資本家的資本，單單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未免太不合理。這想法是沒有認識到以次的事實：民族工商業資本，不獨還未妨害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具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機能。地主富農處於現在的土地佔有關係，沉重的阻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前面我們已分析指明了的。爲着中國大多數人的生活改善，壓抑少數人的不合理利得，剷除其剝削魔爪，有什麼不合理呢？何況地主富農的大量多餘土地，不是從地租高利貸累積起來的錢買來的，便是做官貪污剝削人民的脂膏買來的。取自人民，還與人民，有什麼不合理呢？同時我們還應明白：地主富農購買土地所付的地價本錢，以中國地租率之高，「購買年」（即以地租率除地價額所得的指數）之短，（中國土地購買年最長爲十四年，最短爲七年）很快已收回了，那麼，取消其不合理的繼續剝削特權，難道不應該嗎？所以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至於具有獨占性的自然富源，各大森林與礦山，應收歸國有，更是理所當然。

最後，關於城市地產的處理，目前還很少看到有人提出合理處決的較具體方

案，但現在已面臨需要與農村土地佔有關係一同改造的時候了。我們認為改造城市土地佔有關係，不能全依照有些人所提出「住者有其屋」那樣的原則，因為住在城市裏的人，不一定都是從事正當職業者，漢奸、戰犯、腐敗官僚以及農村都市兩方面居住的地主，在中國城市裏多得很。他們不獨在城市裏佔有大量的地皮；而且住有寬廣華麗的房屋，難道在新中國社會建設中，還能容許這些人享受「住者有其屋」的權利嗎？而許多有助於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正當工商業，現佔有的廠舍鋪店已不够其發展上的需要；所以硬性的「住者有其屋」，不獨等於優待那些腐敗無恥的寄生蟲，而且還會制限正當工商業的合理發展。因此我們認為處理城市地產，以次幾點原則不宜忽略：（一）對於有助於新中國社會經濟建設的正當工商業，確保其原有的廠舍鋪店和所在的地皮所有權，並就社會需要其合理發展所適需而酌予補充。（二）對於漢奸賣國賊貪污官僚以及在農村業已分有應得地產的地主，他們在城市裏的房

房地產應全部沒收，分配於城市中政府機關專任的公職人員和家眷住宿，以及補充上述需要其合理發展而現有不足的工商業。(三)對於無助於新中國社會經濟建設但亦不妨礙的工商業所佔有過多的房屋地產，亦應將其多餘部分沒收分配給其他沒有房屋地產而又需在城市裏工作的人民，如各種無定着性的挑夫車夫苦力勞動者以及小商販和遊動性勞動工作的小手工業者。(四)對於居於城市中專靠收房租而生活的城市地主所有房屋地產，除保留其家人依靠必需生活的部分以外，多餘的應行沒收；其保留的房屋地產，地租或房租亦應合理規定，不能聽任其自由提高。城市地產佔有關係改革處理，在內容上雖較複雜，但能根據合理原則，同樣可以合理解決。

新中國即將誕生，新中國的產業革命，亦無疑的將會迅速完成。歷史現實的發展，固然會無可抗拒的貫徹它；但人們科學的認識了它的發展法則，獲得實踐上的正確指導，那對於歷史現實的發展，是會起着加速促進作用的。我們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產業革命，不單要科學的去認識它，而且要在實踐上去加速完成它。這是我們的責任，同時也是我們應勇敢負荷的神聖使命！

後記

這個小冊子在寫的過程中，却費了兩番功夫：第一次的原稿約六萬多字，並且是以高中程度的青年朋友爲閱讀對象。原稿將寫完時，接編輯負責人盧文迪先生囑：內容及文字應力求明暢通俗，以適合初中程度之青年朋友閱讀爲原則，字數亦不宜過多，最好不要超過四萬字。因此不得不把原稿文字重行刪改節縮，好些統計資料和引錄註解，祇好抽掉。在主觀上，筆者雖力求通俗的來表達內容，但由於平日缺乏修養，這種技巧實在做得很不夠。同時，社會科學有許多術語已成爲一般習慣的語詞，要以很通俗的詞語來表達那些術語的內容，也實在相當難。好在有興趣於社會科學研究的青年朋友，是會多多閱讀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的書本，在這小冊子中有些語詞不夠通俗的地方，總不會無法理解。這小冊的內容是就筆者近幾年來所擔任的「經濟學」和「西洋經濟史」兩科講義中有關的幾章節抽出來寫成的，雖然是很平凡的寫作，但它在當前中國這個劇變的時候寫成，在筆者個人倒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中山大學。